

細讀與嘲諷—《柳如是別傳》讀後隅記

毛 文 芳 *

大 綱

- 一、緒論
- 二、細讀
- 三、嘲諷
- 四、結論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柳如是別傳》1965年稿竟，1969年作者辭世，遲至1980年始出版。二十世紀史學大師陳寅恪撰寫此書適逢中國鉅變之際，因為發言學者站立位置不同，該書遂成為政治隱喻、心跡迷霧與詮釋衝突的代表作。二十年來，史學家們已為此書作了豐富的解讀。筆者不敢妄評近代史學史事，本文既不擬發抒個人對明清痛史的考據癖，亦不擬針對該書的任何課題作延伸性探索。《別傳》一書充滿文學的興味，作者超凡的想像力已將這部史學鉅構飛躍成一部精彩的小說，他帶著讀者在文獻中穿梭漫遊，留意任何一個縫隙，隨作最精密的解讀。行文中又經常展現嘲諷笑謔十足的陳氏幽默，陳寅恪以迂迴婉轉的方式，反射生命衰殘、世事滄桑與時間流逝帶來的焦慮，諧中帶謔，歡中帶痛。書中一方面有作者強烈的主觀意念貫注其間，同時隱晦歷史中的愛情心理亦為時代沾上艷麗的色彩。在崇偉鉅構之前，筆者僅以一名讀者的角度，拈出「細讀」與「嘲謔」兩個閱讀主軸，各自再擬出不避瑣細、作者亦讀者、填補空隙、心理分析、創造性的詮釋，以及訕笑俗陋、調侃窘態、洞穿心機、同情悲憫、深沈感慨等幾重視角，擇錄鋪排《別傳》一書中的精彩例證，視其為文學研究主體參與的最佳典型。

關鍵字：柳如是、錢謙益、陳寅恪、細讀、嘲謔

一、緒論*

(一) 為沈埋者昭雪

明末清初秦淮歌妓柳如是(號河東君),非僅《清史稿》不為立傳,即連常熟方志亦未載柳氏之名。^{註1}後世對柳如是的認識,多仰賴野史軼聞。民國初年史學大師陳寅恪(1890-1969)深諳此一現象,乃由柳的事跡為綱領,以錢柳因緣為核心董理明清一段痛史。其間最大的挑戰是文獻,陳寅恪說明了這段歷史諱莫如深以致文獻紛歧的現象與原因。牧齋事具載明清兩國史,私家著述尚有可考,然河東君資料散在明清之際的著述中,列入乾隆朝違礙書目之故,已亡佚不可得。即使諸家詩文筆記之有關河東君而不在禁燬書籍之內者,亦大抵簡略錯誤、剿襲雷同。

文獻較可靠者,大致為同時代的作者,然紀錄心態卻影響著文獻的客觀性,或好意諱飾,或惡意詆誣。對河東君意多尊重者如顧苓,顧苓之女妻瞿稼軒之子,稼軒與錢關係密切,故當時與稼軒特厚之人如文安之等,皆不獨寬諒牧齋晚節,尤推重河東君。故顧苓〈河東君傳〉筆下尊重之意溢於言表,與瞿稼軒同一觀感耳。當時有超達道人葦江氏,謂顧苓此傳「別有知己之感」,為「阿私所好」,陳寅恪認為葦江氏肆意妄言,完全不明「錢瞿交誼、錢柳關係、君國興亡、恩紀綢繆、死生不渝之大義」。同時代亦有詆誣者,如王澐勝時最

◎拙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今皆據以修改完成,特此致謝。

* 拙文大量擇錄陳寅恪撰《柳如是別傳》原文,筆者所根據的版本,為陳美延編《陳寅恪集》系列之《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印行,2001年1月初版,4月重印本),共有上,中,下三冊。為使引文落註精簡,註文一律標明《別傳》,冊別,頁次,特此說明。

註1 柳如是活動的常熟一地,光緒時修撰的《常昭合志稿》,1948年龐樹森編纂的《重修常昭合志》,均未載柳如是事跡。詳參俞允堯〈秦淮八艷傳奇之(2):柳如是〉,《歷史月刊》,81年11月號。

反河東君。王氏幼為陳子龍弟子，與臥子家屬關係密切，此人文章行誼卓然可稱，然所著〈虞山柳枝詞〉，對柳如是輕薄刻毒醜詆之辭，見諸賦詠，頗不可解。陳寅恪以門戶之見來解釋：「明季士人門戶之見最深，不獨國政為然，即朋友往來、家庭瑣屑亦莫不劃一鴻溝，互相排擠，水火不容」。寅恪考定王勝時孫女字臥子曾孫，結為姻親，但與陳氏家庭往來，臥子生時已然，王灃當係臥子嫡妻張氏之黨，故其所言，既不得不為尊者（其師）諱，又不得不為其親者（師母）諱，遂隱沒其師及張氏與河東君之關係，而轉其筆鋒集矢於河東君之事蹟。同時代人的誣指，另如錢鈍夫肇鼈的〈質直談耳〉，亦然。^{註 2}

如上所述，同時代人曾因立場不同而留下相左的河東君紀錄，至於後代人無知、虛妄、揣測、臆想的現象則更嚴重。陳寅恪本著為沉埋者昭雪的歷史正義感，自認為著書既為珍惜表彰士大夫之「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何況是「婉孌倚門之少女、網繆鼓瑟之小婦」？又何況「為當世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註 3}史家的任務將使不冤得白，對於女性自然也就升起關懷之心，尤其是曠世奇女子，更有待發之覆，此即《柳如是別傳》一書的著述動機。該書既為柳如是之傳記，乃作者對於柳如是一生所作細緻的考察，全書建立在柳如是選婿與歸宿的綱領上。選婿有四個時期，崇禎八年晚秋之前為選婿第一期：松江時期。崇禎八年晚秋至九年再遊嘉定復返盛澤歸家院為選婿第二期：嘉定盛澤時期。崇禎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為選婿第三期：杭州嘉興時期。崇禎十三年十一月選婿第四期：虞山訪錢歸宿。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尋求歸宿的階段亦有三期，第一期：崇禎八年乙亥秋深離去松江到崇禎十三年冬過訪牧齋於半野堂，其實即包含了前述的嘉定盛澤時期與杭州嘉興時期。第二期：崇禎十三年過訪半野堂至崇禎十四年仲夏六月七日與牧齋結禱於茸城舟中止。第三期：崇禎十四年辛巳夏與錢結禱於茸城至此年冬絳雲樓落成止。覓得歸宿後，

註 2 關於柳如是生平的正負兩面解釋，詳參見《別傳》，上冊，頁 38-47。

註 3 引自《別傳》，上冊，第一章，緣起，頁 4。

經過牧齋辭世、錢氏家難而迄於河東君自縊。

該書詳考河東君之本末，主要係取牧齋事蹟有關者附之，起自半野堂初訪前之一段因緣，迄於殉家難後之附帶事件。除牧齋外，其間並詳述其與陳臥子（子龍）、程孟陽（嘉燧）、謝象三（三賓）、宋轅文（徵輿）、李存我（待問）等人之關係。柳氏短暫的四十年生命，寅恪考自柳如是崇禎四年（十四歲）至康熙三年（四十七歲）榮木樓縊死共三十年榮辱經歷，以柳如是的情愛一生為考察線索，詳細建構其選婿的重要歷程，以及明末清初重要文人複雜牽連的關係始末。

（二）陳寅恪的心史

《柳如是別傳》最著名的學術研究是余英時的一系列論著。余氏自 1958 年首度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之後，在偶然機緣下，又完成〈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未料招致大陸內部激烈的攻訐，遂引發兩方長期往復的文字論辯。余氏陸續於 1984、1986、1998 三次將系列論辯文字結集增補成《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建立了以《柳如是別傳》著書旨趣為陳寅恪心史的詮釋典範。為能更深入瞭解陳寅恪寫作《柳如是別傳》的旨趣，茲簡述余英時的相關詮釋如后。

余英時論及陳寅恪在近代學界以淵博著稱，不僅為一「通儒」（中國傳統觀點），亦可謂一「百科全書派」學者（西方啟蒙時代標準）。但陳氏治學開始即偏向史學，並以此為專業，其史學研究與史學思想乃在世變逐步激化下自覺發展而成。陳氏治史有兩個淵源，一方面由清代考證學傳統文字訓詁入手，故對西方「科學的史學」很投契；同時又具有西方史學綜合／匯通的精神，超出個別史實的考證。余英時對陳氏治史提出三變之說：第一變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1923-1932），受晚清西北史地考察風與王國維等人之影響，又與歐

洲東方學潮流銜接而上。此期陳氏研究各族文字，進行二方面研究：一為佛典譯本與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為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關係。此期為研治唐史、西夏史、佛教史的階段。第二變為「中古以降各民族文化之史」(1933-1949)，研究重心為民族與文化的分野，尤適於解釋唐帝國統一與分裂的歷史，開闢了魏晉至隋唐的研究領域。以上二變，前者為點的突破，後者則胸有成竹地有為中世史畫出一幅整體圖像的抱負。第三變為「心史」(1949-1969)，為頌紅粧的階段，有《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兩部以才女為研究對象的作品。二者皆同樣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寅恪視之為所南心史。鄭思肖心史之特徵在於：宋亡元興，鄭氏書中持夷夏之辨特嚴，又有感於「年已垂老，慮身沒而心不見知于後世，取其詩文，名曰：心史。」寅恪其實自視個人著作為心史：「欲明眼人，為我代下注腳，發皇心曲，以俟百世。」研究再生緣或柳如是，據其自訴：「蓋藉此（頌紅粧）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可知別傳一書為其個人心史，亦可視為時代的心史。^{註4}

（三）詮釋的迷霧

《柳如是別傳》1965年稿竟，1969年作者辭世，該書稿出版過程極不順利，遲至1980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十餘年來，與此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各類評述紛紛出爐，至少在大陸地區已舉辦過兩次紀念性的學術會議。

註4 本文針對余英時對陳寅恪治史的三個階段演變的簡述與相關引文，請詳參余英時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331-377。該書所收文章，自1958年首篇〈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到最近1998年寫成者，共有十二篇相關文字。據余英時自述，此書為第三次集結，亦自認為最後一次的結集。應可視為余英時對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四十年來的定論。余氏《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無論讀者認同其觀點到什麼程度，都不能否認該書確已為詩文釋證陳氏晚年心境作出經典論述，成為後出者的詮釋典範。

註⁵其他相關的專書或論文，已匯成了一部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詮釋史。這些詮釋大致順著余英時所揭開的論點，分別由先生之治學與生命兩大範疇展開。有的主訴「以詩證史」、「索隱鉤稽」的方法學在乾嘉考證學派上的運用與新變，註⁶有的將《別傳》置於先生一生的治學歷程中，觀其演變之跡，註⁷有的探測《別傳》的撰述主旨，結合研究對象明清之際的名士志節，與作者的存在處境與時代感受，討論陳寅恪晚年憂困的遺民心境，歸趨作者的晚年自遣與史學自證。註⁸有些學者則大氣魄地為陳寅恪作傳，企圖全面展開陳氏在明末清初痛史、士夫人格情愛等心態、或女性觀等不同面向的發覆與重建。註⁹然

註 5 就筆者所知，到目前為止，關於陳寅恪的大型學術研討會至少有兩次，均為陳氏研治故所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一次於1994年9月1-2日舉行「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後出版專書《「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傳統學術討論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另一次是1999年11月27-29日舉行「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出版《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一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另外，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有《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註 6 關於陳氏以詩證史的治學方法，或論其乾嘉學派的運用與新變的說法，詳參高華平〈也談陳寅恪先生「以詩證史、以史說詩」的治學方法〉，《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6號，1992年，頁78-83。羅志田〈從歷史記憶看陳寅恪與乾嘉考據的關係〉，《二十一世紀》，2000年6月號。

註 7 余英時將《柳如是別傳》置於陳氏史學方法的演變軌跡中觀察，寫成〈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331-377。另亦可參劉夢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論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創獲和研究方法（上、下）〉，《中國書目季刊》80.03、80.06二期。

註 8 如姜伯勤〈陳寅恪先生與心史研究——讀「柳如是別傳」〉，《新史學》84.06。何建明〈陳寅恪的「晚清情結」與他同胡適的關係〉，《歷史研究》6號，1996年，頁176-179。蔡鴻生〈頌紅妝頌〉，收入同註5，《「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傳統學術討論會》，頁35-42。另外余英時關於陳氏的一系列論著，其關懷即屬於此。余氏著作另詳。

註 9 陳寅恪傳有多種，列舉如下：汪榮祖著，《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書局，1976。蔣天樞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臺北：弘文館，1985。吳學昭著，《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1992。汪榮祖著，《陳寅恪評傳》，江西：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初版，

由於陳寅恪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十年間(1954-1964)，正經歷近代中國的滔天鉅變，這部漫長的詮釋史，因為發言學者的站立位置不同，特別在政治解釋的取向上，有所紛歧，使得純粹學術的論辯場域中，加入了敏感的政治聲音與硝煙氣味。^{註 10}如果陳寅恪在書中欲揭開明清痛史之覆，那麼二十世紀後半葉三十年間的學者群，亦合力地亦將《柳如是別傳》寫成了另一部等待發覆的陳寅恪心史。

陳寅恪是二十世紀崇偉的史學家，撰書又逢百年內中國鉅變之際，在噤若寒蟬的年代裡書寫，《柳如是別傳》遂無法避免被「瞎子摸象」式的詮釋命運，以致紛紛擾擾，莫衷一是。^{註 11}這樣一部引發政治隱喻、心跡迷霧與詮釋衝突

1999 三刷。吳定宇著，《學人魂—陳寅恪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註 10 關於《柳如是別傳》一書著述動機與旨趣的討論，余英時曾撰〈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文，發表於香港《明報》18 卷 1 號(1983 年，頁 17-25)，此文後於 1984 年第一次結集成書，成為以詩文釋證陳氏晚年心境的經典論述。該文發表之初，便引起大陸地區以馮衣北為名義者為文反駁：〈也談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余英時先生商榷〉《明報》19 卷 8 號，1984 年，頁 11-16。之後，余、馮二人遂在《明報》月刊引發了往復論戰。在 1983-1985 年間，二人於《明報》18-20 卷，總共發表了九篇文章，馮衣北的駁論文字僅發為三篇而已。馮氏事實上並未建立任何系統論述，僅就余書中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形象的文字加以撻伐，後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成為泛政治化批駁的代表性著作。馮書與余英時後來結集的嚴謹史學著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成為壁壘分明的兩種詮釋模式，在《柳如是別傳》正式出版後五年間，造成了一波熱潮。

註 11 更早以前，於美國任教的汪榮祖教授，著有《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書局，1976)，在余馮這波論戰之餘，汪、余亦有精彩的筆戰。汪氏撰〈賸有文章供笑罵〉，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5 年 1 月)，余氏亦有〈著書今與理煩冤—汪榮祖先生《賸有文章供笑罵》讀後〉(1985 年 2 月)回應。汪氏則又撰〈敬答余英時先生「著書今與理煩冤—汪榮祖先生《賸有文章供笑罵》讀後」〉再次回應。汪氏的論述重點如下：《別傳》一書著述動機很明顯，乃陳氏自陳：緣於一顆紅豆，若言其皆出於政治心境則令人懷疑，該書投射作者於三百年前，出於精神生趣，為錢柳洗冤，仰慕柳之才節。汪氏企圖將余氏的解碼系統拉開，回歸其《別傳》中的文字，以為陳氏的最大貢獻在於匡正明清痛史，並成就了中國婦女史研究，並對錢柳等人於痛史中孤懷遺恨，有恰當理解。此外汪氏以為，《別傳》一書考證是

的曠世傑作，其撰述旨意隨著陳氏辭世將永遠沈埋。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旨意仍可探求，在去「定向化解釋」的新世紀學術氛圍中，《柳如是別傳》的旨意，與其說隱晦，不如說有多重可能，學者由不同的孔道中看到了分別向其召喚的觀點，每種說法都有理據，都可以成立，詮釋觀點愈多，愈顯示出此書的博大與典範性，二十年來的史學家們已作了豐富的整理與解釋。陳寅恪的研究材料與論述語言，看起來很傳統懷舊，然對研究課題的企圖其實很顛覆。具顛覆性的學術課題，必需突破傳統的方法窠臼、另闢文獻領地、創造解釋觀點。因此，《柳如是別傳》何嘗不能視為一部開放的文本？讓該書的詮釋永無終結，所有的學者，都作為詮釋路途中的一位過客，以映射某個時代氛圍、某項學術領域、某種學術方法、某位學者的眼光……。

(四) 本文論題的說明

筆者才學淺陋，不能妄評近代史學史事，尤不敢奢論陳寅恪大師之晚年大作。乃因「柳如是畫像」課題的考察，^{註 12}偶一閱及《柳如是別傳》，便如陷迷霧森林。《別傳》看似僅為一名弱女子之生平傳記，實則不易閱讀。讀者仿

主，寄托是次，反對「穿鑿」，古典可求，今典在大事上亦可通，小事則似是而非，又晚年心境雖可憫，若僅根據蛛絲馬跡而證微言大義，則言過其實。總而言之，余、汪二氏，針對「頌紅粧」的心境其實有基本共識，余氏則建立了《別傳》為其心史的詮釋架構，以為陳寅恪的文化關懷與個人遭遇，促成其寫〈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的動機，其「儒學實踐」的價值系統決定了選定《柳如是別傳》此一專題，而來自於史學上的認知系統決定了處理此一專題的作業程序。其價值系統與認知系統在世變中的操作，在中國適逢「劫盡窮變」嚴峻的考驗中，發揮到極致。（增訂版序頁 3）。無可諱言，余英時自 1983 年至 1998 年，15 年間，對馮、汪、陸（按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臺北市：聯經，1997）等學者提出的各種辯難文字、解釋模式，莫不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推向一位傳統知識分子如何以史筆應世並結合心境的典例，誠為近代中國一大公案。

註 12 詳參拙著〈閱讀柳如是畫像：儒服、粧影與道裝〉，2004 年 1 月 28 日，宣讀於「『陳寅恪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與江蘇徐州師範大學合辦。

如偵探一般，必需注意聯絡照應，保持一貫清晰的思維，對各個線索反覆鉤連，始能有些微領略。本文既不擬發抒個人對明清痛史的考據癖，不擬針對《別傳》一書的任何課題作延伸性探索，更不擬對陳氏的著述旨意再行探究。在崇偉鉅構之前，僅回歸讀者的身份，循著陳寅恪的路徑漫步悠遊。《柳如是別傳》充滿文學的興味，陳寅恪超凡的想像力已將這部史學鉅構飛躍成一部精彩的小說，^{註 13}書中一方面有作者強烈的主觀意念貫注其間，同時隱晦歷史中的愛情心理亦為時代沾上艷麗的色彩。筆者僅以一名讀者的身份，拈出「細讀」與「嘲諷」兩個閱讀角度，擇錄並鋪排《別傳》一書中的精彩例證，視其為文學研究主體參與的最佳典型，願與學者同好分享一代文化遺民、史學大師的經典著作。

二、細 讀

《柳如是別傳》共有上、中、下三冊，共 1250 頁。全書五章：第一章，緣起。第二章，河東君最初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附：河東君嘉定之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第五章，復明運動。（附：錢氏家難）。陳寅恪帶著讀者，在文獻中穿梭漫遊，留意任何一個說話的細節與縫隙，作了最精密的解讀。

（一）不避瑣細

陳寅恪曾自言：「不可以其瑣屑而忽視之也」。陳氏在書中鋪陳其繁富綿

註 13 整體地說，《別傳》寫的是一個充滿著生命和情感完整故事。余英時認為陳寅恪之能重建一個有血有淚的人間世界，不是依靠考據的工夫，而是想像力的飛躍。在此，史家的想像和小說家的想像是其相似的。詳參氏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70-373。

密、不避瑣細的考訂工夫，令人嘆為觀止，對柳如是姓名的考辨，便是一例。柳如是本名「楊愛」，後用唐人許佐〈柳氏傳〉章臺柳故實改姓為柳。蓋楊、柳相類也。「楊愛」一名，諸書多有記載，如宋人《侍兒小名錄拾遺》便曾述錢塘娼女楊愛愛事。又名「影憐」，「憐」與「愛」字義有關。亦名「隱」，陳寅恪以聲類原理解釋，河東君之鄉音，固是「疑」、「泥」兩聲母難辨者，以音近之故，故易「影憐」之「影」為隱遁之「隱」，又一名「柳隱」。當時名媛頗喜取「隱遁」之意為別號，如黃皆令為「離隱」，張宛仙為「香隱」，蓋其時社會風氣所致。陳氏以為治史者，即於名字別號一端，亦可窺見社會風習與時代地域人事之關係。

崇禎八年，柳如是離去南園、南樓，移居松江之橫雲山，至深秋離去松江，遷赴盛澤歸家院，結束了與陳臥子的戀情之後，改姓為「柳」，以「蘼蕪」為字。直至崇禎十四年仲夏六月七日與牧齋結禱於茸城舟中，此後便不再以「蘼蕪」為稱。故「蘼蕪」一名的適用期，只在崇禎八年夏至十四年六月七日之間。寅恪頗訾後人通以「柳蘼蕪」稱之，乃未諦視之故，至於人稱其「蘼蕪山下故人多」，乃當時社會制度壓迫使然。河東君崇禎十三年冬季訪半野堂，始「易楊以柳，易愛以是」，之前繪畫皆鈐「柳隱書畫」之章，亦隨鈐「我聞居士柳如是」。河東君既心許牧齋，自不應再以隱於章臺柳之「柳隱」為稱。雖「如是」之稱已用於未遇錢氏之前，既不以「隱」為名，便以「我聞居士」與「柳如是」的連稱，取其字「如是」下一字為名，而為「柳是」。錢氏廣引柳姓世族故實，取柳姓郡望，號之為「河東君」。柳如是尚有許多別號如雲、美人、嬋娟……等，亦分別在文士詩文中暗藏為戀慕的符碼。由此可知，柳如是陸續形成的名號與其生命階段息息有關。^{註 14}陳寅恪以柳如是終能歸死於錢氏，殺

註 14 關於柳如是之姓氏別號，詳參《別傳》，上冊，第二章「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頁 16-37。疑、泥不分的聲類推斷，參頁 100-101。而「蘼蕪」一稱考定，參頁 217-222。

身以報牧齋國士之知，故於一部《別傳》通稱其為河東君，以概括一生始末。那麼陳寅恪由柳如是之名姓謹考細繹，宜視為明其志、悲其遇，非僅為偶然涉筆之便利也。

陳寅恪不厭其煩地考證主線外的許多旁枝，考河東君嘉定之遊行踪時，由嘉定縣志、文人文集以及相關傳記中，探察嘉定一地的名園，鉤稽出嘉定文士們的園宅關築，如汪無際之墊巾樓、唐叔達之唐氏園、張崇儒之蘊園、孫中丞之元化宅、張景韶之嘉隱園、張鴻馨之杞園、李流芳之檀園、閔士籍之猗園、李文邦之三老園，^{註 15}由地理、時間、文士交遊等多重線索，考定了誰先關築？誰為鄰居？先後搬遷進住的狀況？以方位與時間重建崇禎八年嘉定的地理實況，還原河東君寓居、遊宴地點，以及程孟陽、唐叔達、李流芳、宋珏、汪明際諸人與河東君共相往來酬和活動的軌跡。

據寅恪所考，認為河東君嘉定之遊，雖僅其個人艷史的一部份，卻影響重大。主線索之外的任一旁支，作者皆本著細緻的手法加以考定，顯示任何一件史事都有不可忽略的瑣細證據，歷史是由無數的細節縱橫交錯建構而成。明清痛史誠然是崇偉悲劇的大歷史，但牽連這個大歷史的每一位小人物，其生命中偶然的遇合與行跡，亦足以發展成驚天動地的歷史場面。陳氏原不解何以於河東君遊嘉定後一百五十年，鈍夫如錢肇龍《質直談耳》傳述其與徐三公子、宋轅文之軼事，「猥瑣詳悉，一至若此」，等到寅恪蒐檢方志，始知「巷陌舊名，風流佳話，劫灰之後，猶有未盡磨滅者。」^{註 16}陳寅恪以其參用明清之際筆記雜俎的史料手法，「不避瑣細」地「節外生枝」，密密織縫出一段經緯脈絡交錯紛紜的歷史。

註 15 關於嘉定一地文士們的園宅鉤稽，詳參《別傳》，上冊，頁 147-171。

註 16 本段文意，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71。

陳寅恪自述不避瑣細，尋求本事，才能還原歷史人物的真面貌，以下舉幾個生活小事加以說明。程孟陽有詩曰：「數日共尋花底約，曉霞初旭看新蓮」二句，陳寅恪以程老少寐，清晨即起與名姝共賞樓前新荷，推測此非偶發事件，河東君十七歲妙齡少女，必性喜早起，始能追隨耄耋詩老作此遊賞，用以窺見河東君日常生活習性。^{註 17}又論孫元化火攻大砲之史實，論及滿洲語稱「漢軍」為「烏珍超哈」，不稱「尼堪超哈」，推其原故，蓋清初曾奪取明室守禦遼東邊城之仿製西洋火礮，並用降將以管領使用，故有「烏珍」的名號。孫元化一事涉及明清興亡關鍵，故附談名物瑣事以旁釋，又舉《兒女英雄傳》中安老爺以「烏珍」為長姐兒命名的敘述互證，說明：「民族興亡之大事及家庭瑣屑之末節，皆能通解矣。」^{註 18}河東君與牧齋詩中皆曾用「因」字，寅恪大幅討論明人「因」字用法，吳人呼女為「因」，寅恪討論所指應「白因」，為二人之女（後適趙管為妻），膚白。接著，陳氏又舉許多掇科射策之文，因「因」字所涉各種革黜爭議事。由於與河東君之女趙管妻及黃皆令直接間接均有關，故不得不詳引資料，以供論證。陳寅恪於此自謂：

刺刺不休，盈篇累牘，至於此極，讀者當以為怪。鄙意吾國政治史中，黨派之爭，其表面往往止牽涉一二細碎之末節，若究其內容，則目標別有所在。……職是之故，不避繁瑣之譏，廣為徵引，以見一例。庶幾讀史者不因專就表面之記載，而評決事實之真相也。^{註 19}

陳寅恪針對個別史事，已窮源溯流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陳寅恪解讀柳如是詩作，如拆七寶樓臺，以河東君〈夢江南·懷人〉二十

註 17 本段文句推證，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75-176。

註 18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58-159。

註 19 引自《別傳》，下冊，「復明運動」，頁 925-949。

首為例，陳氏以語語相關，字字有著的態度，尋繹典故的線索包括了李煜《花間集》、晏殊《珠玉詞》、《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傳〉、蔣防〈霍小玉傳〉、湯顯祖〈紫釵記〉、〈玉燕敘事〉、《玉臺新詠》、《樂府詩集》、《拾遺記》、李清照《漱玉詞》……等。作者推敲語彙運用、引證史事、連類相及等手法交互穿插解讀詩文，以合柳如是寫作心境。甚至還以書風字體辨偽，柳詩中有一「褻」字，因文意不通，陳寅恪以河東君喜作瘦長體書研判「褻」字疑是「蕪」字之訛寫。^{註 20}陳寅恪具有傳統文人博雅多識的豐厚學養，學問範圍無遠弗屆，詩文釋證偏向傳記式鉤稽，然在傳記資料匱乏的狀況下，釋證工作只能在字裡行間鉤沈索隱，參互推證，在細節中建立歷史。

(二) 作者亦讀者

《柳如是別傳》一書中有兩種話語：一是歷史人物在文獻中發出的話語，另外則是陳寅恪的評點案語。《別傳》一書時時在文中角落，看到作者不斷置入自己：透過旁白、評論、責罵、感慨……等豐富的主觀意見，信筆拈出，像個說書人一樣上陣說書，隨時提醒讀者，「我」現身在此，也儼然是位明清時期的飽學讀者，在案頭冊籍文本上朱墨評點。陳寅恪既是《別傳》一書的作者，同時又是明清一段痛史的讀者，不斷在歷史撰述中轉變著書寫的語調。

舉例而言，寅恪在探討程孟陽、錢牧齋二人與柳如是的關係時，曾引程孟陽小傳：「孟陽讀書不務博涉，精研簡練，……晚尤深老莊荀列楞嚴諸書，鈎纂穿穴，以為能得其用。」另引全祖望〈錢尚書牧齋手跡跋〉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接著陳氏對二人的宗教信仰頗有疑惑，曰：「牧齋之禪力，固不能當河東君之魔力，孟陽之禪力，恐亦較其老友所差無幾。」調笑錢程二人的禪定之力不敵對紅粉之迷戀。陳寅恪接

註 20 相關考證，參見《別傳》，上冊，頁 260-270。

著插入了一段與正文不甚相干的文字。寅恪憶及十餘歲時，讀牧齋所作之蒙文鈔本，數年後又見另一舊本蒙鈔，鈐牧齋印記。故述及曩時與鋼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楞嚴經》之著述與乾隆滿蒙藏文譯本參校推譯，並提出譯本真偽的意見。末言：「當寅恪與鋼君共讀此經之時，並偶觀尚小雲君演維摩登伽女戲劇。今涉筆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覺為之一嘆也。」^{註 21}此段內容可說是由《楞嚴經》岔出完全與正文無涉的回憶文字，像這類文字便成為作者現身、傾吐讀者反應的重要證據。寅恪將明清痛史的嚴肅學術考證與個人生命經驗記憶的考索，創成今 / 古、研究者 / 研究對象相互穿插、彼此映照、共同對話的特殊文本。如果這些文字亦是作者珍貴生命經驗的表述，那麼吾人著意於寅恪在書中，究竟置入了什麼話語，也就更能深切體察著書的幽微旨趣。

人事變遷的考察在時間推移下起伏隱現於書中，這是陳寅恪另一項重要的讀者反應。例如程孟陽〈朝雲詩〉八首之四「助情絃管鬪玲瓏」一句的解釋，陳氏舉韋莊〈憶昔〉詩作為引典注腳，韋詩次句「子夜歌清月滿樓」，恰合孟陽上句當時程、唐杞園夜宴柳如是，極歌唱酣醉之樂。陳寅恪接著改變語調，以預測的視角將時空展延至十年後，就會應驗韋詩的末兩句：「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故而認為程詩在歡樂氣氛中似乎預示了一場即將來臨之大難。寅恪由史實中考定河東君崇禎七年時有嘉定之遊，當時「歌舞昇平，猶是開元全盛之日」。越十年，則是南明弘光元年，原來宴遊往來之地，酬酢接對之人，「多已荒蕪焚毀，亡死流離，往事回思，真如隔世矣。」再引「嘉定縣乙酉紀事」以證之，當時滿清入關，殺戮最慘之地，揚州之外應推嘉定。鮑照的〈蕪城賦〉在《昭明文選》中列遊覽類，河東君遊嘉定亦為遊覽，其平生與幾社勝流交好，必精通文選。弘光元年嘉定屠城之役，寅恪置身柳如是的心扉曰：「翠羽明璫與飛絮落花而同盡。河東君起青瑣之中，躋翟萼之列，聞

註 21 以上文字，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78-179。

此慘禍，眷念宗邦，俯仰身世，重溫參軍之賦，焉得不心折骨驚乎？」行文至此，寅恪又轉以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身份發言，在此慘烈大禍中，唯一可稍慰藉者，乃當日冶遊相與遊宴之諸老如唐叔達、李茂初、程孟陽皆已作古，得免於身受目睹或聞知此東南之大劫，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讀者在孟陽「助情絃管鬪玲瓏」與韋莊「子夜歌清月滿樓」兩句之間，究竟看不出有任何關連，原來陳寅恪是要讀者這樣看的：「姑不論松園之詩本何字，但讀者苟取孟陽並端己所作兩詩連貫誦之，則別有驚心動魄之感焉。」寅恪帶著讀者閱讀程孟陽此詩句，實已超出孟陽詩人的經驗範圍，以讀者之便，將五代韋端己的詩句演成程孟陽所無法預見的未來視域。^{註 22}

同樣的解詩策略，亦出現在孟陽〈朝雲詩〉第五首釋孫元化園。明清之際，孫元化曾以火器礮彈舉事，當時嘉定以海邊小鎮起兵抗清，終受清兵屠戮之禍，其攻守成敗，乃繫於礮銃彈藥之強弱多寡，寅恪曰：「然此端豈河東君與諸老當日遊宴此園酬酢嬉娛之際，所能夢想預料者耶？」^{註 23}現在的歌舞酣樂不能預見未來的亡國悲慟，二者的對照如此突兀。寅恪這時以全知角度籠罩此詩，游移於十年之間，江南名士與青樓艷妓的春花秋月，在歷史的探照下，悲劇性顯得特別強烈。對程孟陽而言，寫作當時何來亂離之感呢？研究者解詩容許有主觀臆測的空間，寅恪竟然置入了千里眼，讀出十年後的黍離之悲。

牧齋長河東君三十六歲，自當先死，絕不敢有「白首同歸」之望，必以死後未竟志業託河東君。豈料牧翁以黃毓案所累，河東君雖欲從死，然竟得生。直到牧齋死後三十四日，河東君自殺相殉，故陳寅恪讀牧翁詩：「敢倚前期論白首，斷將末契結朱顏」，竟成了一句讖語，奇哉！悲哉！陳氏站在後來者的

註 22 程孟陽原詩參見《別傳》，上冊，頁 177。寅恪韋莊詩典故考證與史實推定，詳參頁 179-182。

註 23 相關考證參見《別傳》，上冊，頁 183-184。

方便視角，瞻眺未來，詩句有如預言成讖，陳氏舉亞力斯多德論悲劇（前不知古人）、王國維論紅樓（後不見來者）而能符會，以悲劇為陳柳一段情事作結。註²⁴寅恪解詩跳脫詩人時間的限制，古今詩文典故充作讀者延伸思考的利器，其意似乎不僅止於重建歷史現場與還原寫作心理而已，還要帶領讀者盡力推延，預見將來，譜出更具時代感受的絃外之音。

（三）填補空隙

陳氏對於程孟陽〈緬雲詩〉的題名推定，大力發揮了想像，以下簡述其推定過程。第一個名稱是「停雲」。李流芳、程孟陽二老皆曾以「停雲」一詞入詩，「雲」借指河東君，「停」為停留，有鍾情之意，頗合二老心境。然陳氏考察「停雲」出自陶詩〈停雲詩序〉之「停雲思親友也」，以為河東君與嘉定諸老，只可稱為「友」，未能為其「親」。而陶詩義正辭嚴，不宜挪借作為綺懷之題，此或可推測程孟陽作詩賦題排除「停雲」的理由。第二個名稱是「綵雲」，陳氏由詩中一句「風前化作綵雲行」推測該組詩題原擬作〈綵雲詩〉，此應與白香山之詩有關，白居易有〈簡簡吟〉一詩結語：「彩雲易散琉璃脆」，後接〈花非花〉：「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以知孟陽賦朝雲詩必由〈花非花〉來，與河東君來去無定所甚合。然〈簡簡吟〉後半敘述蘇家小女早夭，故用此名似為不祥之辭，故改之。再次，陳寅恪翻檢《樊川集》得「孤直緬雲定」之句，適與河東君之擅長歌唱者，頗相符合，遂改「綵雲」為「緬雲」。註²⁵程孟陽〈緬雲詩〉的定題過程，是否如寅恪所推測曾經二次改易不可得知，寅恪透過比對與聯想細細填補空隙，虛擬推求而得，真可謂為程孟陽的千古知音。

註 24 參見《別傳》，上冊，頁 347。

註 25 陳寅恪對於程孟陽《緬雲詩》題名由停雲、綵雲更改為緬雲的推測過程，詳參見《別傳》，上冊，頁 196-204。

陳寅恪不僅對柳如是充滿敬意，亦讚賞其寫作才華，以為其學問淵博、天才超越，故能靈活運用典故，無生吞活剝之病。寅恪釋解柳之詩文，自言：「語語相關，字字有著」，^{註 26}但是索隱至極，亦難免陷入迷霧歧路。崇禎八年，河東君和臥子詩〈秋柳〉八首之三有句曰：「人似許玄登望怯」，她自比有遊山登臨記載的許邁（字叔玄，後改名玄），而自謂「登望怯」，非體羸足小之故，而是與許玄同樣畏怯於見客避跡之意。^{註 27}崇禎十三年冬，河東君訪牧齋於虞山半野堂，初贈其詩為「江左風流物論雄」、「東山蕙嶺莫辭從」，則以牧齋比於謝太傅，自比為東山伎。此時牧齋為候補宰相之資格，與謝太傅身分切合也，自喻亦當。寅恪以為：河東君不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無間，且擬人必於其倫，胸中忖度，毫釐不爽，上官婉兒玉尺之譽，可當之無愧。^{註 28}至於前此曾以不過雲間孝廉的陳臥子比為貴為右軍的王逸少，非簪纓科第之族的陳臥子怎堪比於王謝之子？河東君亦曾自比為社會階級不合的閨秀謝道蘊，均嫌過分。寅恪以為河東君詩作儘量作到「擬人必於其倫」，已難能可貴，不免用錯典故，牽連混及，雖不切當，然亦不必過於苛責也。^{註 29}

寅恪以為：「文人才女之賦詠，不必如考釋經典，審覈名物之拘泥。」^{註 30}詩文字句中，含有許多空白，自然有賴讀者予以填補。然深入瑣細，考究用典，尤其那些連類鉤連之典故，已宕出原句甚多，精細入微以至或否有過度解釋之嫌？不得而知，由此可證陳寅恪釋證頗有跨越作者的宏圖。

陳寅恪論及牧齋學問極淵博，為文亦故作僻奧之句法，藉以愚弄當日漢奸文士之心目耳，解讀奧文亦寅恪最感挑戰之任務。牧齋有詩句「籬邊兀坐村夫

註 26 引自《別傳》，上冊，頁 260。

註 27 參見《別傳》，上冊，頁 312-319。

註 28 參見《別傳》，上冊，頁 319。

註 29 參見《別傳》，中冊，頁 437、頁 453。

註 30 引自《別傳》，上冊，頁 266。

子，端誦尚書五子歌。」引白樂天〈與元九書〉曰：「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蓋暗指清世祖荒於遊畋、耽於歌樂之意。另參酌順治皇帝詢問梅村《秣陵春傳奇》參訂者宜園主人之事與董小宛未死事等，知牧齋之詩皆實指當時史事，若清政果如世祖荒樂而衰，則明室復興可望，牧齋於詩中寄放了深深的寓意，不可以遊戲文章等閒視之。又考牧齋詩曰：「史癡畫笥徐霖筆，弘德風流尚未闌。」討論江寧以畫為隱的楊亭，藝術境界可上追弘治、正德時期的史忠、徐霖，相與媲美，斯亦明室仍可復興之微意。而徐霖故實又與武宗正德下江南（幸南都）有關，希望南明桂王亦能效正德皇帝一樣得幸南京。寅恪為牧齋此一詩句的思維空隙作了密實的填補。前文曾指清世祖耽於歌樂，此又提出承平時幸江南盛傳風流佳話的正德皇帝，寓託南明遺老對桂王於政治上的復興寄望，美色逸樂與政治圖謀雖為二事，然牧齋詩引前者為後者之掩護，將女色與政治作了很好的換喻。^{註 31}

（四）心理分析

《柳如是別傳》一書，對於無從由文獻表象確考的人情事理與關係，寅恪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加以彌縫，曾自言「視此心理之分析」。^{註 32}據余英時所言，陳氏對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包括喜、怒、哀、樂、虛榮、輕薄、負心、怯懦），都有深入的認識，對性格亦準確掌握，不同於佛洛伊德探索潛意識的「心理分析」。佛氏亦承認通常情況下，判斷一個人性格，只要根據其在行動思想上的自覺表現，便已足夠。史家的歷史重建根據人們的行為、談論和詩文，大體上都是自覺層面上的事，如西方史學家寫傳記一樣，通過豐富想像力逐步由外在表現進入內心世界，其實並不必需進入傳主的潛意識中才能談其

註 31 陳寅恪關於牧齋詩與反清復明微意的探討，詳參見《別傳》，下冊，頁 1123-1126。

註 32 引自《別傳》，中冊，頁 577。

心理活動。^{註 33}本節將由這個角度略作探索。

《別傳》一書，試圖重建柳如是選婿與尋求歸宿的人生過程，寅恪深入體察各種處境下的女性心理，以下將試引數例以明之。崇禎十三年河東君離杭北行，此次遊杭，時經三月之久，中間患病頗劇，自有所為而來，必有所為而去。在給汪然明的信札中曰：「流光甚駛，旅況轉淒。恐悠悠此行，終浪遊矣。」其辭悽感，發病嘔血，亦由於此。蓋當崇禎十二年己卯歲末，河東君已二十二，美人遲暮，歸宿無所。西湖之遊，本為閱人擇婿。汪然明深識其意，願作黃衫，為覓佳婿。然則河東君此行，終至其事不諧，應與謝象三有關。汪然明為河東君覓婿計，謝象三之年齡資格家財及藝能四者，均合條件。然象三氣量褊狹，手段陰狠，復挾多金，欲娶河東君而不遂其願，遂大肆誹謗，散播謠言。然明因此即轉介其情人與牧齋。如果後來河東君所適之人非牧齋者，則其人當不免為象三所傷害。由今觀之，柳錢之因緣，其促成之人，在正面為汪然明，在反面則為謝象三，豈不奇哉？由此可知，當日河東君擇婿之艱，處境之苦，更可想見矣。^{註 34}

關於柳如是心理，再進一說。錢牧齋作有合歡詩、催妝詞，並在其《東山洲和集》中，載錄合歡詩和作十五人，二十五首，催妝詞和作三人，十首。由於牧齋當日以匹嫡之禮與河東君結褵，為當時縉紳輿論所不容，故當時這些和詩之年輩較長者，大都近於山林隱逸或名位不甚顯著之流，其他大多數悉是牧齋門生或晚輩。唯有一事最可注意者，即合歡詩及催妝詞兩題，皆無河東君和章。寅恪認為河東君早歲詩學受「幾社」推崇文選學影響，多涉生硬晦澀藉

註 33 參見余英時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71-372。

註 34 以上關於河東君離杭前的心境苦難，相關考證文字很長，筆者文中僅引結論而已。參見《別傳》，中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頁 403-404、417、434-436 等。

此自標新異。嘉定之遊與程李輩往返後，詩學漸進，始知不能仍挾故技以壓服一般文士，故自《湖上草》以後，篇什風格已轉變，所以不和作，藉以藏拙。寅恪以為上說是部份理由，宜進窺河東君當時之心境。河東君舍臥子而就牧齋，其思想情感苦痛嬗蛻之痕跡，充分表現於詩歌篇什。此番如和〈合歡詩〉與〈催妝詞〉，寅恪言：「若作歡娛之語，則有負於故友（臥子）；若發悲苦之音，又無禮於新知（牧齋），以前後一人之身，而和此啼笑兩難之什，吮毫濡墨，實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故選擇不和以應，可知其處境之艱辛與用心之良苦。^{註 35}

河東君命運漂泊，寫詩對牧齋可說是剝肝瀝血以為書詞，實令讀者不忍卒讀。牧齋〈有美詩〉百韻，乃河東君別去後，答其送遊新安之作，實為其文集壓卷之作。而河東君感激牧齋之知遇，亦有詩作回應，其中「祇憐不得因風去，飄拂征衫比落梅。」「飄拂」二字適為形容己身行踪之妙語，「落梅」二字，亦於無意間不覺流露其身世飄零之感。寅恪推其為明代難得之絕妙好辭也。關於〈有美詩一百韻〉，後世有不同理解。除牧齋外，最能通此詩之意者為河東君。陸敕先以同情河東君的角度注詩。而錢遵王本與河東君立於反對地位者，無論牧齋用事有所未詳，則懷有偏見，不肯為之闡明。崇禎十三年冬至次年春期間，二人初識行事之曲折、兩方複雜針對曲折心理的探求，在懷有預設立場且史實諱莫如深的文獻環境中，連陳寅恪亦自不免興嘆：「僕病不能也」。寅恪所可注意之處，在於錢柳二人當日之行踪所至與用意所在，自述：「搜取材料、反復推尋、鉤沈索隱，發見真相」，至於「能否達到釋證此詩目的之十分之一、二，殊不敢自信。」^{註 36}

註 35 關於合歡詩、催妝詞的探討，詳參《別傳》，中冊，頁 658-662。

註 36 關於牧齋〈百美詩一百韻〉寫作動機與評價的相關討論，詳參《別傳》，中冊，頁 591-593。

以下略述陳寅恪對陳臥子、程孟陽、錢牧齋等諸位男士的愛情心理探求。河東君嘉定之遊期間，陳氏以人情世故等傳統士大夫之應世模式，細部推敲程孟陽追慕柳如是心理狀況。松圓詩老程孟陽與其他好事勝流，自河東君離去嘉定後，眷戀不忘，非僅形諸吟詠而已，更取其寓膠最久之「適園」亭樹之名，作為其香車經遊園巷之美稱。如「聽鶯橋」、「天香橋」、「隱仙巷」等，殆效世俗「德政碑」、「去思碑」之類。^{註 37}寅恪深諳男性戀慕青樓的情色心理，如「某人到此一遊」般為風流印記。

錢牧齋、陳子龍時相往來，卻於崇禎十四年約兩個月間無詩，《有學集》中未見此時臥子踪跡。依二人交誼篤摯，當日牧齋不應無詩書以答臥子厚意，然刻《初學集》時卻刪去不錄，應同於刪去酬答臥子禾城贈詩之例，似為避去柳陳關係之嫌，若非牧翁刪，則必由錢氏門生瞿稼軒為師母諱也。同樣地，錢牧齋為另一情敵程孟陽刻書，亦故意遺忘書中考證甚詳的小事，尤其於陳柳二人最親暱的事件，均加以隱晦避談，亦依人情推知與心理狀態而作的推測。^{註 38}此外，河東君曾囑咐牧齋買婢，揆以當日情勢，江浙地域亂離之後，豈有買婢不得之理？古之婢 / 妾不分，故不是買不到，乃不敢買也。後來牧齋卻買來一把唐斝琴給河東君，買一只摩羅目侯給女兒，表達了賢夫慈父之愛。寅恪細緻地揣摩了柳如是的嫉妒心理與牧齋的畏妻心理。

陳寅恪針對陳、錢二人行事心理的探索，亦有從經濟層面加以考慮者。當初陳臥子之家，人多屋狹，其妻張孺人擁有財務支配權，必不能有餘地、餘資安置志在獨立門戶之河東君，故陳柳婚姻失敗，當與此有關。^{註 39}至於牧齋則急營我閨室迎之入居，姻緣得成，應係主因。牧齋為築金屋（絳雲樓）以貯美

註 37 參見《別傳》，上冊，頁 169-170。

註 38 詳參《別傳》，上冊，頁 219-221。

註 39 關於陳臥子的經濟狀況與陳柳婚姻失敗的關連，詳參《別傳》，上冊，頁 44-45、頁 120。

人，不得不忍痛割其所愛趙家漢書珍本，鬻於謝象三。牧齋對此其為心痛：「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註 40}寅恪引出此文，說明牧齋賣宋槧書為建絳雲樓，顯露經濟/收藏、文化/愛情等矛盾心理，既爭柳是，但天下尤物不可得兼，於此益信。當時謝象三購書時，還要壓低二百金，分明招這位老座師之難堪。數年之後，牧翁曾贈詩給張縉彥（張坦公司馬），為這位「憤軍之將、亡國大夫，兼不死之英雄」作〈張坦公集序〉，敷衍千餘言，希得潤筆厚酬外，又欲藉諛辭感動張氏，以取其購得謝賓三之宋槧兩漢書，庶幾以圓其古籍 / 美人共貯一處的美夢。可惜坦公未能遂其願，後來趙家漢書流落他所，遂入清內府。^{註 41}

牧齋以匹嫡之禮待河東君，殊違反當時社會風習，招來多數士大夫不滿實屬必然，但牧齋執意如此，乃估量捨此不能求得河東君同意。之前宋轅文、陳臥子，因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錯失與河東君之良緣。牧齋則悍然不顧，乃平日之心理與行動本有異於宋、陳二人，又當時牧齋被稱為「天巧星浪子」，名流推為「廣大風流教主」，因而獲致河東君點頭，嫡庶的考量有很大關係。^{註 42}寅恪考證一則崇禎十五年正月〈遊黃山記序〉一文，曾邀約訂程孟陽黃山之遊，然孟陽當時已卒，故此則依陳氏判斷，應係事後追憶，以致筆誤耳。寅恪判斷當崇禎十三、四年冬春之交，牧齋值新知初遇、舊友將離、情感衝突、心理失常之際，作〈遊黃山記〉，又逢河東君患病甚劇，撫今追昔，不勝感慨。記錄

註 40 初學集〈跋前後漢書〉，引自《別傳》，中冊，頁 405。

註 41 關於錢牧齋鬻書的事蹟，詳參《別傳》，中冊，頁 404-423，下冊，頁 917-920。

註 42 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653-654。

時間有所舛誤，乃牧翁「精神恍惚，記憶差錯」，以致如此。^{註 43}至於順治崩逝之際，牧齋喜悅，寓遵王宅，張燈夜飲，以表慶悅，但〈與遵王〉尺牘中卻寫下：「但四海邊密，哀痛之餘，食不下咽，只以器食共飯……」，陳氏以為牧齋所言，乃故作掩飾之語，與其內心感受適相反也。^{註 44}

陳寅恪透過心理分析編造人物作為、推測事件、臆想人情、串連史跡，以進行嘲諷與論評。

(五) 創造性的詮釋

在解讀錢柳詩作的過程裡，陳寅恪總以知音的立場透析他們的寫作心理，並賦予精彩的創造性詮釋，〈男洛神賦〉可視為一個典例以闡明之。〈男洛神賦〉是河東君遺存作品中最可注意且有趣者，寅恪將之視為一費解的公案，^{註 45}該賦所涉問題有二：(一)為誰而作？(二)成於何年？寅恪解讀的過程極有趣。由於河東君早期受幾社名士選學影響甚深，故陳氏由《昭明文選》尋索典故以解讀此賦。首先解決「水仙」典故，陳氏考察《紅樓夢》中的水仙典故應來自蘇詩，然以臥子鄙宋詩的詩學態度而放棄了這個線索，另覓他典。陳氏在此不避諱展示個人的為學過程，不吝告訴讀者他曾經想過後來放棄的想法。河東君交遊廣闊，〈男洛神賦〉可在酬和之作的前提上尋思：此賦酬答誰？誰曾以水仙或洛神警視之？柳如是因戲作以相報酬。由此線索推求，發現當時確有許多文人視柳為洛神，其一為汪然明，曾在詩中譽其「美女如君是洛神」，但然明當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可能「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且然明有自知之明，故〈男洛神賦〉主角應非汪然明。其次的可能人選是陳子龍，臥子曾賦〈水仙花〉

註 43 詳見《別傳》，中冊，頁 624。

註 44 參見《別傳》，下冊，頁 1205。

註 45 關於〈男洛神賦〉的考釋文字，詳參《別傳》，上冊，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頁 136-143。

詩，時正當少壯之年，此數年間與柳情好篤摯，符合子建「神光」之句，且是河東君心儀的人選，有充分的理由視其為「男洛神」。

寅恪考證至此，又插入一段讀者意見：「自河東君當日出此戲言之後，歷三百年，迄於今日，戲劇電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謂預言竟驗者矣。」^{註 46}寅恪在解釋典故的推論過程中，發揮了讀者自由無拘的想像力。

陳寅恪既鎖定了陳臥子為〈男洛神賦〉的書寫對象，再由賦文中去坐實這個推想，一方面以劉孝綽、謝靈運之文才比臥子；另一方面認為臥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東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因緣遇合，殊非偶然者矣。其次駁斥「男洛神」為宋轅文的說法，轅文當時雖為美才少年，與柳又有白龍潭寒水浴之佳話，^{註 47}實可抵男神之形。但宋氏不似臥子有〈湘娥賦〉等洛神相關作品，故河東君以賦酬和宋氏的可能性極低。接著寅恪又曰：「噫！臥子抗建州而死節，轅文諛曼殊以榮身。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雍也》）豈不誠然哉？豈不誠然哉？」^{註 48}人格氣度也是陳寅恪不傾向接受河東君書寫之「男洛神」是宋轅文的主要原因，這樣置入讀者道德判斷的歷史推考，又是讀者參與的充分表現。

以柳如是為核心的歷史隱晦難明，陳寅恪在尋求線索、拼合事蹟的工程中，多賴索隱鉤稽，並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提出創造性的解釋。〈男洛神賦〉中有一對警句：「聽墜危之落葉，既萍浮而無涯」，陳氏另尋柳如是二首詩〈聽

註 46 引自《別傳》，上冊，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頁 137。

註 47 關於白龍潭之浴一事，詳見錢肇鼈《質直談耳》〈柳如是軼事〉條，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68-69。

註 48 引自《別傳》，上冊，頁 141。

鐘鳴)、〈悲落葉〉作旁證，以言其自抒身世之意。二賦前有自序曰：「鐘鳴葉落，古人所嘆。余也行危坐戚，恨此形骨久矣。……因做世謙之意，為作二詞焉。」世謙為蘭陵蕭綜字，二詩題原見《梁書·蕭綜傳》，然與〈男洛神賦〉引句的關連為何？寅恪仍無甚把握：「河東君之以世謙自比，是否僅限於身世飄零，羈旅孤危之感，抑或其出生本末更有類似德文者，則未能詳考，亦不敢多所揣測也。」行文至此，雖無確解，陳氏仍然擺列了兩條可作補充的重要線索。^{註 49}陳寅恪深刻地理解並推崇柳如是，認為其乃效曹子建〈洛神賦〉自述經歷的撰寫心跡為此賦，故寅恪以「協玄響於湘娥，正匏瓜於織女」作為〈男洛神〉之要旨，指出該賦實乃河東君自述身世歸宿之微意，應視為誓願之文，傷心之語，可與子建比美。然而當代與後世，竟以佻達遊戲之作品視之，詆笑世人膚淺至極。〈男洛神賦〉究竟是柳如是的戲作？還是有對象指稱的情賦？若是後者，又究竟是誰？這些費盡思索的推考，陳寅恪以創造性的理解為此賦作了最佳註釋。

《柳如是別傳》一書，有時像章回小說道盡人物歷史典故，作者像評點者，透過綿密的書寫，不斷補充、注釋、對話，淋漓盡致地展示讀者反應，賦予創造性的詮釋，再舉一例簡述如下。河東君曾以一通信札向汪然明借舫春遊：

早來佳麗若此，又讀先生大章，覺五夜風雨淒然者，正不關風物也。羈紅恨碧，使人益不勝情耳。少頃，當成詩一首呈教。明日欲借尊舫，一向西冷兩峯。餘俱心感。

如何解釋柳如是尺牘中所言之事？寅恪引汪然明幾段文字作說明。其一為《不繫園集》壹〈不繫園記〉云：

註 49 賦序與陳氏之言，兩段文字皆引自《別傳》，上冊，頁 143。

(天啟三年)癸亥夏仲為雲道人築淨室，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為舟。四越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

又引《隨喜庵集》〈崇禎元年花朝題詞〉云：

余昔構不繫園，有九忌十二宜之約。時騷人韻士，高僧名姝，嘯詠駢集。董玄宰宗伯顏曰隨喜庵。

另《春星堂詩集》壹〈汪然明小傳〉對其西湖遊舫記載曰：

製畫舫於西湖。曰不繫園。曰隨喜庵。其小者，曰團瓢，曰觀葉，曰雨絲風片。……余家不繫園，亂後重新，每為差役，不能自主。

可知然明之西湖遊舫頗多，有大小兩類，河東君所欲借者，當是團瓢觀葉或雨絲風片等小型遊舫也。^{註 50}

汪然明是否借了遊舫給河東君？陳寅恪引一篇極有趣的文獻作旁證以助推測。黃汝亨曾代汪然明作「不繫園約款」，其中「十二宜」有「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四類人品之條，陳氏針對此四類人品，證說河東君皆足以抵之。以河東君之姿貌，其為「美人」自不待言。「知己」往往發生於兩方相互關係，河東君與汪然明之情分，即就三十一通尺牘觀之，已可概見，然明與河東君可互為知己也。「名流」雖指男性之士大夫言，然河東君感慨激昂，無閨房習氣，其與諸名士往來書札皆自稱弟，又喜著男子服裝。適牧齋後，牧齋視之為高弟、記室：「河東君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客有挾著述，願登龍門者，雜沓

註 50 本段文字，由該通尺牘探討的種種引證，參引自《別傳》，中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頁 380-381。

而至。錢或倦見客，即出與酬應，客當答拜者，則肩筠輿，代主人過訪於逆旅，竟日盤桓，牧翁殊不芥蒂。嘗曰，此吾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為柳儒士。」（《牧齋遺事》「國初錄用耆舊」條）故知河東君實可與男性名流媲美。至於「高僧」，由表面觀之，似與河東君絕無關係。然河東君在未適牧翁之前，即已研治內典。所作詩文，如與汪然明尺牘（二十八、二十九兩通），以及初訪半野堂贈牧翁詩（見東山訓和集壹）即是例證。牧齋〈有美詩〉云：「閉門如入道，沈醉欲逃禪」，實非虛譽。總而言之，河東君固不可謂之為「高僧」，但就其平日所為，「超世俗，輕生死」兩端論之，「亦未嘗不可以天竺維摩詰之月上，震旦龐居士之靈照目之。蓋與『高僧』亦相去無幾矣。」

寅恪以為上引黃汝亨所擬人品四類之約款，雖汪氏生平朋好至眾，恐以一人而全具此四類之資格者必不多有，唯河東君一人之身實足以當之而無愧。河東君欲借湖舫時在崇禎十二年春間，當時名妓如林天素已返三山，楊雲友亦埋骨西泠，至若織郎王修微則又他適（按：歌妓王修微前曾有一詩「寄題不繫園」）。汪然明所擁之諸遊舫，若舍河東君而不借，更將誰借耶？⁵¹陳寅恪在考察柳如是上引尺牘時，乃將西湖遊舫視為當日社會史之重要材料，考察過程還附記了明末亂後汪氏遊舫之情況，聊見時代變遷並誌念盛衰興亡之感。⁵²陳氏針對一封尺牘及黃汝亨的約款，以及作者對柳如是人品的推想，創造性地詮釋了汪然明願將遊舫出借河東君的理由。

註 51 關於陳寅恪針對柳如是四類人品相抵的考察，與相關引文，詳見《別傳》，中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頁 381-383。

註 52 陳寅恪以物質如「不繫園」作為探究社會史之重要材料，另有一例。柳如是的醫生江湛源（德章之字），曾獲錢氏贈「紅豆莊玉杯」。牧齋家收藏玉杯不少。後人張漢儒以為牧齋以世俗艷稱寶物，聳動權貴，藉誣牧齋，言其謀取白玉杯，世稱一捧雪，一只到手，又造金壺一把饋送官吏，寅恪以為不可信。事實上，玉杯乃明末士大夫家多有，可供當日研究社會風俗者之參考。南京迎降，牧齋以此薄禮（一只玉杯），表己廉潔，致贈豫王。牧齋除擁有精槧圖書外，別無珍品。參見《別傳》，中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頁 815-816。

三、嘲 諷

著述期間，陳寅恪對時間流逝、生命衰殘呈現出莫大的焦慮，由若干詩作約略可知：

乙未舊曆元旦讀初學集〈〔崇禎〕甲申元日〉詩有：「衰殘敢負蒼生望，重理東山舊管絃」之句，戲成一律。

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琪案復有疑滯，感賦一律。

丁酉陽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適在病中，時撰錢柳因緣詩釋證向未成書，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賦一律。

賦詩最能表達此焦慮心境：「歲月猶餘幾許存」、「然脂暝寫費搜尋」。寅恪寫此書竟曰：

十年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項蓮生（鴻祚）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

有涯之生如何遣得？

惜別漁舟迷去住，封侯閨夢負綢繆。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綿綿死未休。

世局終銷病榻魂，謬臺文在未須言。遺屬只餘傳慘恨，著書今與洗煩冤，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

寅恪非以消遣娛樂之事遣有涯，無益之事，乃是在「歲月猶餘幾許存」的生命

流逝中，「欲將心事寄閒言」。

託將心事的閒言如何表出？陳寅恪讓明末清初的歷史時空在各種文獻的交織與遇逢中重建，眼力逐漸喪失的陳寅恪，口耳卻異常發達。聽覺敏銳的他，不僅在書中重現了歷史現場的管絃聲、戰火聲，還有那發自內心的哭聲：

高樓冥想獨徘徊，歌哭無端紙一堆。天壤久銷奇女氣，江關誰省暮年哀。殘編點滴殘山淚，絕命從容絕代才。留得秋潭仙侶曲，人間遺恨總難裁。^{註 53}

詩中有冥想、歌哭、省哀、滴淚，這些聲音轉作對人物或事件的嬉笑怒罵，透過其口說出，筆者最感興趣的，就是那嘲諷笑謔十足的陳氏幽默。行文中，訕笑、調侃、洞悉、悲憫、感歎等各種嘲諷笑謔的聲響此起彼落，隨著寅恪的臆想化在筆下，填滿文獻的隙縫，迴盪讀者的耳邊。陳寅恪以迂迴婉轉的方式，反射生命衰殘、世事滄桑與時間流逝帶來的焦慮，諧中帶謔，歡中帶痛。

筆者以下選擇與柳如是一生密切相關的幾位男士陳子龍、程孟陽與錢謙益等，觀察陳寅恪如何以輕重程度不等的嘲謔筆法，一一剖析其心跡。

（一）訕笑俗陋

《柳如是別傳》穿插了陳寅恪對天下笨伯嘲陋辨誣的嗤笑。例如一般庸陋校注者將陳臥子稱柳如是為「女弟」易作「女弟子」，殆由淺人習聞袁枚、陳文述廣收女弟子之事，蓋師弟尊卑殊等於舊日禮教上不能有婚姻之關係。是以袁、陳二人搜羅當日閨閣才媛，列諸門牆，不以為嫌。若是因此認為陳子龍為隨園碧城仙館主人一流人物，「此端頗為可笑。」^{註 54}另考證杜牧詩句：「東風

註 53 以上所引陳寅恪相關詩文偈語，皆引自《別傳》，上冊，頁 5-6。

註 54 參見《別傳》，上冊，頁 89。

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究竟赤壁之戰時吹的是什麼風？由《三國志》中得知「時東南風急」，證明應係「東南風」，杜牧因受限於七律的字數而刪去「南」字。寅恪曰：「實則當時孫軍在江南，『東』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東風』之語，已成口頭禪，殊不知若只借東風，則何燒走曹軍？儻更是東北風者，則公瑾公覆轉如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詞所謂「灰飛烟滅」，而曹阿瞞大可鎖閉二喬於銅雀臺矣。一笑。陳寅恪考訂典故，在辨流俗之誤時，常對陋俗提出訕笑。」^{註 55}

關於董其昌與楊雲友的事，寅恪又可一笑。據陳氏考訂，徐樹敏錢岳選《眾香詞》書集族里隊有成岫詞三闕，小傳略云：

成岫字雲友，錢塘人。性愛雲間董宗伯畫意，臨摹多年。每一著筆，即可亂真。今臚媚而失蒼勁者，皆雲友作也。年二十二，尚未有偶。戊子春，董宗伯留湖，上見雲友所做書畫甚夥，自不能辨，後得徵士汪然明言其詳，即為蹇修，遂結褵於不繫園。雲友歸董之後，琴瑟靜御，俱譜入《意中緣》傳奇。有《慧香集》。

寅恪駁此小傳為妄。其一，董其昌為萬曆十六年戊子舉人、十七年己丑進士，此之前，聲名尚未甚盛，書畫何能為人摹倣如此之多？其二，汪然明造不繫園湖舫，在天啟三年，上距萬曆戊子有三十五年，董成二人豈得預先於尚未造成之舟中結褵？謬誤殊甚。陳寅恪推測為何會遭致這麼大誤解？殆後人讀芥子園意中緣劇曲，不解所述玄宰與雲友的關係，乃笠翁遊戲之筆，竟信為實有其事，寅恪譏諷曰：「可謂天下之笨伯矣。聊附於此，以博一笑。」^{註 56}

錢牧齋造絳雲樓時，資金不足，求售宋版漢書，當時謝象三向牧齋購買漢

註 55 參見《別傳》，上冊，頁 155。

註 56 參見《別傳》，下冊，頁 372-373。

書時，曾再壓低書價 200 金，致錢氏這名老座師甚為難堪。然而這位與錢爭柳的謝氏，雖得到了牧齋一寶，然二十年間，既失去柳如是，旋又失去漢書，寅恪以為此乃謝氏人品卑劣有以致之，徒令人訕笑，殊不足令人憫惜也。^{註 57}

(二) 調侃窘態

陳寅恪對陳、程、錢三子與柳如是的互動，皆有輕重不一的調侃。陳臥子會試未中式，牢騷憤慨，作書數萬言，極論時政。同時復以詩酒自娛，此詩酒即「放情聲色之義」，前代相傳俗語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陳寅恪調侃其乃臥子此時心境的寫照。^{註 58}

陳寅恪對明末的老山人程孟陽調侃最多。依程氏〈朝雲詩〉等綺懷篇什考定程柳二人的關係，程孟陽對河東君之迷戀，可謂筆底情意無限。程老於崇禎七年冬季展閔氏妹墓於京口後，感老成之無幾相見，因留居嘉定，與諸友日夕遊宴，事實上另有原因。河東君嘉定之遊，所居住遊宴之地，曾先後就程孟陽嘉燧、唐叔達時升、張魯生崇儒、張子石鴻磐、李茂初元芳、孫火東元化諸人居宅或別墅之所在，因而使程唐諸老「顛狂傾倒」，前二字來自程的詩句：「顛狂真被尋花惱」，寅恪再加上「傾倒」二字，可見作者嘲諷的力道，一至於此。臨別時，程唐輩必與柳如是預定重遊練川之約，故程再遊嘉定，在踐此宿諾也。程一句詩：「買斷鉛紅為送春」，與賞牡丹有思想上之聯繫。時既春盡，人間花事已了，而天上仙葩忽來，春光猶在，故言「為送春」也。然寅恪舉孟陽此詩與杜甫「江畔獨步尋花」相較，則以為境界大異，陳氏曰：「杜公尋花，不過偶然漫興，優遊閒適，而程唐諸老，則奔走酬酢，力盡精疲，自與杜公迥異也。」

註 57 參見《別傳》，中冊，頁 407。

註 58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94。

註 59

河東君當日遊嘉定，程唐諸輩必輪次遞作主人，以宴此神仙賓客，寅恪用的字眼極有趣：「斯乃白頭地主（按暗諷程唐諸老）認為吳郡陸機（諸老自比）對錢塘蘇小小（比喻柳）所應盡之責任，如天經地義之不可逃避者（諧諷）。」再細味程孟陽詩，有春宵一刻值千金之心意，恐這只是孟陽片面之想，而非河東君，竟作此語：「春心省識千金夜，何太不自量耶？」^{註 60}至於柳如是於崇禎七年初秋離嘉定返松江後，練川諸老當有《孟子·滕文公》所謂「孔子三月無君（按借作「河東君」），則皇皇如也」之情狀，竟以大雅孟子經句比譬諸老對紅粉佳人的眷念，^{註 61}陳寅恪以為程唐諸老對柳如是的迷戀，是一種不自量力的綺懷夢想，尤對程孟陽戲諷調侃得辛辣夠味。

陳寅恪對於錢牧齋亦多以嘲諷調笑的口吻，挾發錢牧齋嫉妒、吃醋、衰老、歎衰等細微心態。例如牧齋〈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詩并序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戲作採花釀酒歌一首，以詩代譜。其文煩，其辭錯，將以貽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

寅恪謂河東君所具「天福」，或可言具善飲之「天福」耶？那麼牧齋雖不具善飲之「天福」，但能與具善飲「天福」者相對終老，殆亦可謂具「艷福」之人矣。又論牧齋與河東君老少配，《牧齋遺事》曰：

牧翁……既得章臺，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然年已六十矣。黜

註 59 陳寅恪針對程孟陽綺懷詩作〈朝雲詩〉八首，作大篇幅考證，為重建柳如是嘉定之遊的交遊實況，〈朝雲詩〉相關考證，參見《別傳》，上冊，「河東君嘉定之遊」，頁 143-215。本段文字，分別引自同書，頁 147、172-173。

註 60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77。

註 61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95。

顏鮐背，髮已皤然。柳則盛鬚堆鴉，凝脂竟體，燕爾之夕，錢戲柳曰：我甚愛卿髮黑而膚白也。柳亦戲錢曰：我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作詩有「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裡山應想白頭」。

這則語言交鋒的笑談，不止於牧齋遺事而已，當時許多筆記均有記載。陳寅恪另引一則江熙《掃軌閒談》曰：

錢牧齋寵姬在柳如是前，有王氏者，桂村人。嬖倖略與柳等。會崇禎初，有旨以禮部左侍郎起用，牧齋殊自喜，因盛服以示王曰，我何似？王睨翁戲曰，似鍾馗耳。蓋以翁黑而髯故也。翁不悅。……遂遣王歸母家，居一樓以終。

寅恪引此二條記錄戲謔牧齋，謂其晚年腰圍忽肥，即使與西漢張丞相蒼無異，但其面膚之黑，當仍與北宋王丞相安石之「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無異也。夫膚黑之介甫，亦能位至丞相。可惜那位桂村王氏學不稽古，不知援引王安石故事，以逢迎牧齋之意，顯見其才智不及河東君遠甚。牧齋之所以前棄王氏，後寵柳如是，豈無故哉？繼而寅恪又舉白樂天與牧齋相較，認為樂天年四十九已白髮爛斑，其「面黑頭白」與崇禎十三年牧齋五十九歲共河東君互作戲謔之語時，二人形貌約略類似，但不同的是，樂天的「喜老自嘲」詩，是出於白才子自己手筆，非出自「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之佳人，而錢柳「面黑頭白」的才辯詩「柳窺青眼，山想白頭」則出於柳如是之口，大有差別矣。
註⁶²柳如是諧謔夫君，另有一例。其曾作詩題「聚沙老人」之詞，牧齋六十歲，正可尊稱為「老人」，然「聚沙」本童子之戲，此當指牧齋於崇禎庚辰辛巳冬

註 62 關於河東君「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裡山應想白頭」一句所引發的黑白笑談，詳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542-545。

春之間，共河東君聚會，顛狂遊戲，與兒童幾無少異，正如左氏春秋謂「猶有童心」者。陳寅恪以為河東君特取此童老相反之兩義，合為一辭，可稱雅諢。然則河東君之放誕風流，淹通典籍，於此更得一例證矣。^{註 63}

至於絳雲樓之築，陳氏推測乃牧齋效韓愈有二妾：「絳桃」與「柳枝」，「絳雲樓」命名不只為阿雲，亦兼寓惠香。^{註 64}是牧齋野心極大，自比昌黎，欲儲二美於一金屋，甚可笑矣。膚黑欲效介甫，頭白不及樂天，蓄妾又不比韓愈，陳寅恪引例戲諢，著實調侃了牧齋幾回，暴露其人生窘態。

(三) 洞穿心機

陳寅恪考證之餘，如前文所述擅用心理心析以推想人情之實，經常採取嘲諷笑諢的角度，洞穿歷史人物的心機。

首先是程孟陽。孟陽〈七夕詩〉有句云：「針樓巧席夜紛紛，天上人間總不分」，寅恪調笑曰：唯不知諸老中，誰有牛郎之資格？若以年齡論，孟陽較唐李二人為少，程（孟陽）七十歲、唐（叔達）八十四歲、李（長蘅）七十一歲，其所以偏懷野心者，殆由三人中最少的理由乎？無論如何，此三者任一人

註 63 參見《別傳》，中冊，頁 590。

註 64 寅恪由作為閨名的惠香（惠香閣，崇禎九年出現於文中）與作為女性名的惠香（初現於崇禎十三年冬）出現時間不同，產生了不同於我聞室之外的另一理想阿嬌居所的推測（頁 473-），那麼，誰是惠香？確是一大公案。經寅恪推定，此人乃河東君密友，後又獨立門戶，但河東君絕非惠香。有幾種可能，或是河東君妹楊絳子（頁 478-），或是名姝卞玉京（或是女道士淨華，頁 504-）。寅恪由牧齋文中每提惠香必有一桃字，頗如韓退之有二妾（頁 820）。關於絳雲樓之命名（取真誥）建築之所在地、焚燬之時日、與其相關的事情與考釋（頁 836-）。牧齋有常熟城內住宅、白泖港紅豆山莊、絳雲樓兼備藏貯圖書及家庭居住接待賓客（樓上貯書、樓下接待賓客，並有廂房供留宿之用。黃皆令曾來住過或住樓下廂房或閣（樓上）客房（頁 830）。絳雲樓有說在半野堂樓上，在牧齋常熟城中住宅、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附有絳雲樓附圖，並說明。以上諸段推測，均請詳參《別傳》，中冊。

皆不得以杜少陵〈飲中八仙歌〉中「宗之瀟洒美少年」相況，寅恪一再以諸老年齡嘲諷。在嘉定「男女同席，履舄交錯」的實況下，程孟陽大有獨佔柳的野心，竟不畏唐李諸老之見妒！而河東君以妙齡之交際名花來遊嘉定，其特垂青眼於此窮老之山人者何？非有所倦戀，自不待言。寅恪認為河東君之歌曲點拍，必就學於諳曉音律之孟陽，而書法可能亦受孟陽的影響。^{註 65}青樓與文士之交往，互取所需，文士迷戀美色，歌妓尋求晉身之階，勢屬必然。在此，將窮老山人與妙齡歌妓各懷鬼胎的心理，淋漓表出。

〈七夕詩〉又有句云：「堪是林泉攜手妓」。寅恪以李白〈示金陵子〉詩「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為典說明。孟陽以金陵子比河東君，固頗適切，但終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若要以東山謝安自比，程孟陽無此資格，當孟陽賦此詩之際，必不能料想到別有一東山謝安石（即錢探花）日後將與河東君結緣。寅恪的說法非常有趣，認為讀此詩非應視為河東君前日之舊史，乃為後來之預識耳。^{註 66}該詩末句：「莫輕看作醉紅裙」，陳氏又引韓退之〈醉贈張祕書〉其中一節來解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程唐輩乃嘉定貧子，其款待河東君之宴席，當如孟陽自述之「蔬荀盤筵」（另詩），而非長安富兒之「盤饌羶葷」，陳寅恪譏諷孟陽借取韓句，聊以自慰自豪，然心底一股寒酸之氣，仍流露紙背，用這樣自卑的情緒以賦「伎席」、「艷詩」，令後代讀者不覺失笑。^{註 67}

孟陽〈朝雲詩〉有句云：「知卿塵外蕙蘭心」，按寅恪以為「卿」字是非常親密關係的稱謂，錢牧齋直到崇禎十四年六月七日與河東君結褵以後，始正式取得此稱呼：「不唱卿家緩緩吟」（錢詩），可證知河東君實以安豐縣侯夫人自

註 65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72-174。

註 66 相關引文與討論，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87-189

註 67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89-190。

命。寅恪曰：「孟陽於此，可謂膽大於姜伯約矣。宜乎牧齋選詩，痛加刪削也。」又〈今夕何夕〉詩題與詩句，寅恪引《詩經》「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句朱子集傳：「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辭也。」^{註 68}再以譏諷眼光洞悉了孟陽對柳如是的用心。

錢牧齋的諸種心機亦逃不過寅恪之眼。牧齋曾經不阻止當時李長蘅之侄李繼仲為狹邪之遊，且洋洋有喜色。寅恪在此推測其必為與河東君無涉之狹邪遊宴，否則妒嫉心作祟的牧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應轉為鬱鬱有憂色矣。^{註 69}又當時名姝王修微有〈不繫園〉詩一首，收入錢氏《列朝詩集·閩集》，另汪然明《春星堂詩集》第壹《不繫園集》亦錄同一詩，唯題文略異。牧齋所選者題仍舊文：「汪夫人以〈不繫園詩〉見示，賦此寄之」。惟「夫人」二字，原文疑作「然明」二字耳。此二字牧齋改易的機關何在？豈牧齋因王修微適許霞城後，與汪之情誼有所不便之故耶？陳寅恪以為汪然明之夫人，雖不如劉伯玉妻段氏之興起風波，危害不繫園之津渡，但恐亦不至好事不憚煩，而寄詩與修微也。寅恪以為牧齋此故作狡獪，欲蓋彌彰，真可笑矣。^{註 70}

平生以宰相自期的牧齋，於萬曆三十八年（二十九歲）曾求官，天啟元年（四十歲）又求官，到崇禎十六年（六十二歲）建絳雲樓時，仍求宰輔，之後仍念念不忘。寅恪調笑曰：此老功名之念（邯鄲之夢不醒），兒女之情（羅浮之夢仍酣），至死不衰，^{註 71}道盡錢牧齋一生政治與愛情的幻夢。「錢謙益心艷揆席」，惜牧齋自崇禎晚年至清順治末，約二十餘年，前後欲賴馬士英、左良玉、鄭芝龍三人作政治活動，終無所成。傳統有三生之說，寅恪則為牧齋更作三死之說：1)南都傾覆，河東君勸牧齋殉死，而不能死。2)牧齋遭黃毓祺案，

註 68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191。

註 69 引自《別傳》，上冊，頁 167。

註 70 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383。

註 71 參見《別傳》，中冊，頁 823。

幾瀕於死，河東君使之脫死。3)牧齋因病而死，河東君不久即從之而死。陳寅恪洞悉熱中官位、貪生畏死的牧齋心機，頗有譏嘲：世情人事，如鐵鎖連環，密相銜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衝破解脫，然未可以是希望於熱中怯懦之牧齋也。^{註 72}

(四) 同情悲憫

儘管訕笑世俗之鄙陋、調侃士子之窘態、尖刺洞悉其心機，然這些嘲諷卻是諛而不虐，帶著悲憫世懷。例如陳臥子文史之暇，流連聲酒，納寵於家，復閱女廣陵，終不遇也。然臥子既不滿意蔡氏，仍納為妾，必出其妻張孺人馭夫之意，欲藉此杜絕其夫在外「流連聲酒」，用心雖苦，終不生效，寅恪以為張孺人雖甚可笑，亦頗可憐。^{註 73}

雖陳寅恪總是不忘諧諷嘲諷程孟陽，然將其置於錢氏人生情態的對照面，則油然而生起同情悲憫之心。據陳氏考索孟陽與牧翁的關係，於二人文集中見之。二人平生論詩之旨極相契合，唯就崇禎十三、四年冬春間兩人之交誼而言，陳寅恪殊覺孟陽可笑可憐。牧齋迎娶河東君已成定局之際，正是程孟陽綺艷夢想破滅之時。此際，程孟陽循昔年在牧齋家度歲之慣例，欲至常熟縣城。錢程會晤之時，即「我聞室」將告成之際。錢力邀程孟陽於十二月二日，同至虞山舟次，往迎河東君遷入新成之金屋。^{註 74}孟陽本欲徇例往牧齋家度歲，忽遇見河東君亦在虞山，遂狼狽歸里。牧齋又約其於西湖賞梅，孟陽因恐河東君亦隨往，故意負約不至杭州。俟牧齋獨遊新安，訪孟陽於長翰山居，孟陽又復避去，蓋未知河東君是否同來之故。及牧齋留題於山居別去之後，孟陽返家，始悉河東君未隨來遊，於是追及牧齋留於桐江，作最後之一別。三月一日梅花謝後，

註 72 參見《別傳》，下冊，頁 852-854。

註 73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99。

註 74 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529。

牧齋始入舟往杭，孟陽遲遲其行，撲空赴約，故意避免與河東君相見。寅恪深嘆：「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馳，藏頭露尾，有如幼稚之兒童為捉迷藏之戲者，豈不可笑可憐哉！」^{註 75}

由程氏〈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韻奉贈〉、〈次牧齋韻再贈〉二詩結尾，陳寅恪揣測孟陽已明知己身非牧齋之敵手，自甘退讓，情見乎辭，頗覺可憐。若就當日程錢二人心理推之，牧齋必為喜，而孟陽則轉為悲矣。^{註 76}後來居上者錢謙益急迫躍進，可謂誇唐叔達於地下，傲程孟陽於生前，孟陽與牧齋真一悲一喜也。「不覺失笑，調侃古人」，陳寅恪之所以用調笑、譏諷的筆調面對文獻中的程孟陽，因孟陽在任何立場上，皆不足以柳如是與之匹配，程既貧寒蒼老，自然不能符合年輕放誕花費浩鉅盛名歌妓之期，因此，愈顯露其對柳如是納娶的野心，程孟陽愈讓人洞穿心機的窘態自然百出，此外，程孟陽又不如復社陳臥子的家國情操，與有自沉決心的柳如是更不能匹敵，陳寅恪對程孟陽的詩文釋證鉅細靡遺，在嘲諷的語調有同情悲憫的情懷。

對錢牧齋亦然。牧齋為河東君築絳雲樓，所費不貲，牧齋忍痛割其皮藏趙文敏家漢書珍本，鬻於謝象三。柳如是與宋槧漢書二者，正是天下不可得兼之尤物，於此益信。牧翁平生兩件尤物：其一為宋槧兩漢書，擁有二十年，每日焚香禮拜，後不得不割愛給情敵，不能殉葬入土。另一尤物則是河東君，奪之謝三寶手，每日焚香禮拜達二十五年之久，身歿後，猶能殉身。嗚呼！牧齋可以無憾矣。牧齋於垂死之時，作〈病榻消寒雜詠〉第三首〈追憶庚辰冬半野堂文讌〉詩云：「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註 77}牧翁臨終猶不能忘情，顯示河東君對他意義重大。

註 75 相關引文與討論，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625-626、642。

註 76 參引自《別傳》，中冊，頁 540。

註 77 參見《別傳》，上冊，頁 229。

牧齋有詩曰：「心長尚似拖腸鼠，髮短渾如禿幘雞。」謂己身已薙髮降清矣。史惇記「牧齋薙髮」條曰：「清朝入北都，孫之獬上疏云，臣妻放腳獨先。事已可揶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頭，眾皆洶洶。錢牧齋忽曰：頭皮癢甚。遽起。人猶謂其篋頭也。須臾，則髡辮而入矣。」頗有譏諷之意。牧齋亦有尺牘「與常熟鄉紳書」云：「諸公以剃髮責我，以臣服誚我，僕俯仰慚愧，更復何言。」故自作薙髮解嘲文。寅恪對牧齋之薙髮一事，極調笑之，儘管如此，其迫於多鐸兵威而降清，至少不像孫之獬迫使其妻（河東君）放腳，以致辜負良工濮仲謙之苦心巧手也。（濮曾為柳如是製作精美弓鞋）寅恪又一笑！^{註 78}牧齋曾用一典故罵當日降清之老漢奸輩，雖己身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猶存，殊可哀矣。牧齋曾自傷己身無地可託以寫此一段痛史，實則牧齋心境：在弘光前為清流魁首，然自依附馬阮，迎降清兵後，身敗名裂，即使著書，能道當日真相，亦不足取信於人，方之蔡邕，尤為可嘆矣。^{註 79}陳寅恪細體錢牧齋於政治愛情心理，降清固其一生污點，乃由其素性怯懦，迫於事勢所使然，對牧齋無傷大雅的揶揄嘲諷，實寄予無比的同情。^{註 80}

（五）深沈感慨

陳寅恪詼諧嘲諷的聲口，置於人事滄桑的觀察上，透露出了無限感慨。早先河東君居松江時，最密切之友人為宋轅文、李存我、陳臥子。後來錢柳於南都得意時，轅文在何許？尚無確證。但河東君早與宋轅文絕交，必不相往來。李存我此際供職南都，河東君既已送還問郎玉篆，則昔日一段因緣，於此了結。唯獨陳臥子令柳如是「一念十年拋未得」，故這些關係人可能曾受牧翁（在南都授禮郎尚書）招宴，陳寅恪此際帶領讀者去想像：「能否從青瑣中窺見是夕

註 78 關於牧齋薙髮事考證，參見《別傳》，下冊，頁 934-936。

註 79 參見《別傳》，下冊，頁 1174。

註 80 參見《別傳》，下冊，頁 1044-1045。

筵上存我及牧齋並諸座客之面部表情如何耳？一笑。」^{註 81}作者站在一個敘述者便利的旁觀角度，賦予人間無奈的感慨。

程孟陽〈緬雲詩〉乃舊新悲樂異同的樞紐，既述孟陽，亦述牧翁一生之轉捩。舊/程/悲、新/錢/樂。牧翁於〈題張子石湘遊篇小引〉云：「孟陽晚年歸心禪說，作緬雲詩數十章，蟬媛不休。至今巡留余藏識中。……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染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爾。」牧齋此文作時，孟陽已久卒矣。若牧齋此言可信，則「歸心禪說」之老人，窮力盡氣，不憚煩勞，一至於此。河東君可謂具有破禪敗道之魔力者矣。^{註 82}陳寅恪針對孟陽之於河東君的心結、以及與錢二人優劣立場關係之辨，可笑可憐之態，表述得淋漓盡致。

陳寅恪曾引牧齋「天魔似欲窺禪悅，亂散諸華丈室中」二句，以為楞嚴之『天魔』，為維摩之『天女』，造語構思巧切，果係「晚深楞嚴，鈎纂穿穴」。又引全祖望「錢尚書牧齋手跡」，譏牧齋劫灰後，歸心佛乘，聞一官員守道，春夏將往訪之，曰：「望塵干索，禪力何在？」全祖望譏諷牧齋「醉翁之意不在酒」，雖究心佛乘，而干祿之心仍熾，不覺為之發出笑聲。寅恪在此提出：「牧齋之禪力，固不能當河東君之魔力，孟陽之禪力，恐亦較其老友所差無幾。吾人今日讀松圓此詩並謝山此跋，雖所據論者有別，然亦不覺為之一笑也。」^{註 83}陳寅恪擅於評比，並舉松圓充滿遐思的兒女情意與牧齋汲汲干祿之求相較，益發流露出對真實人生的同情，嘲笑聲伴隨著感歎聲交疊出現。

錢謙益曾作〈顧與治書房留余小像自題四絕句〉，寅恪結合牧齋身世闡述如下。絕句一：

註 81 參見《別傳》，下冊，頁 869-880。

註 82 參引自《別傳》，上冊，頁 228。

註 83 參見《別傳》，上冊，頁 178-179。

峻嶒瘦頰隱燈看，況復撐衣骨相寒。指示傍人渾不識，為他還著漢衣冠。

本詩引漢代李廣不封侯之歎，有所寄託：首兩句言其長相瘦削，身在明清兩代，終未能作宰相之意。末二句則謂己身已降順清室，為世所笑罵，殊不知弘光以前，固為黨社清流之魁首呀！感慨悔恨之意，溢於言表。絕句二：

蒼顏白髮是何人，試問陶家形影神。攬鏡端詳聊自喜，莫應此老會分身。

末二句自謂身雖降清，心思復明，自嘲殊有分身之妙術也。絕句三：

數卷函書倚淨瓶。匡牀兀坐白衣僧。驪山老母休相問，此是西天貝葉經。

表面屢稱老歸空門，實際後來曾有隨護鄭延平之舉動。今故作反面之語，以遜辭自解，藉之掩飾也。絕句四：

褪粉蛛絲網角巾，每煩稷（按禾改為木）拂拭煤塵。凌煙褒鄂知無分，留與書帷伴古人。

頭戴「網巾」為明室所創，前此未有，故「網巾」可作為朱明室之標幟。周吉甫《續金陵瑣事》「萬髮皆齊」條曾說明：「太祖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遂為定式。」另戴名世有〈畫網巾先生傳〉（收入《戴南山先生全集》），言某先生必先畫網巾於額上，始加冠，皆示不忘舊朝之意。^{註 84}

註 84 關於牧齋畫像的題句，參見《別傳》，下冊，頁 1169-1171。

陳寅恪以為：牧齋詩不獨限於小我兒女離別之私情，亦攸關民族興亡之大計，至今讀之，猶有餘慟焉。《投筆集》詩意摹擬少陵，入其堂奧，自不待言。集中牧齋則多軍國之關鍵，為其所身預者，與杜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就此點言之，此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少陵猶勝一籌，為三百年來之大著作也。^{註 85}

如上所述，陳寅恪以錢氏擬於杜甫，甚至就詩史角度而言，略勝一籌。既一再推崇錢牧齋文筆精妙，唯對其人品則頗有微疵，然而寅恪仍願意站在人情之實，出於同情與悲憫之心寬待之，故對牧齋戲謔嘲諷的笑聲，有時亦隨而沈重了起來。

四、結 論

(一) 孤懷遺恨

陳寅恪的歷史研究，具有顛覆中心、邊緣解構的傾向。尤其晚年志在「頌紅粧」，自揭：「效再生緣之例，非做花月痕之體也」，明顯在頌紅妝之節操，非男女旖旎之事，故成一別開生面、顛覆舊規的作風。過去說書人多為盲者，清初《再生緣》為彈詞文本，盲女唱彈詞，更是冷僻鮮人聞問的文學課題，寅恪由《再生緣》文本入手，便有自居邊緣的意味。西方荷馬以瞽者寫史詩，寅恪晚年失明，便以瞽史自視。《柳如是別傳》以一名青樓歌妓為主軸，引相關文人生平、詩例、典故、傳聞、史實，重新賦予傳記人物生命真實感，以近乎小說聯想補白的筆法，捨棄大歷史的敘述，選擇青樓與貳臣等邊緣人物，重建情愛關係，鑽研歷史的細縫，企圖建立嚴肅而湮埋不彰的明清痛史。

註 85 參見《別傳》，下冊，頁 1193。

陳氏寫作緣於二十年前的一顆紅豆，^{註 86}重讀《錢謙益集》，藉以溫舊夢，以寄遐思(文人的感性)，以驗所學之深淺(學者的自我期許)。該書歷經十載，嘔心瀝血，完稿於錢柳逝世三百年，陳寅恪頗以錢謙益自況，不僅在於「博通文史、旁涉梵夾道藏，研治領域，有約略近似」而已。錢柳文詞難解，惟殘缺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令寅恪感泣不能自己者。陳氏顯然要作牧齋之異代知己，更呼應「幼時已感世變」的感受，明末清初沈痛佚史的閱讀心理，在史家研究筆下產生效應：既回顧古代，亦照見當世。錢氏歷經國亡浩劫、孤懷遺恨的遺民詩文寄託，深深打動陳寅恪，故申言珍惜並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錢既以隱晦的詩歌語言保存歷史，寅恪作為錢氏異代知己，便「以詩證史」解開隱語回溯一段亡佚的歷史；^{註 87}這個解開詩文隱語的《柳如是別傳》既保存了一段降清的歷史，陳寅恪身處文化浩劫的時代鉅變中，自言「痛哭古人，留贈來者」，《柳如是別傳》何嘗不是其「孤懷遺恨」的生命隱喻？

(二) 遊戲試驗

註 86 寅恪自云：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參見陳氏《詠紅豆并序》，引自《別傳》，上冊，頁 1。

註 87 《別傳》下冊大抵處理牧齋復明的心路歷程。錢氏另一抱負在修史，牧齋《列朝詩集》在順治九年陸續刻成，至順治十一年始全部發行。實因其生平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國史，然丙戌(順治三年)北京南還後，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續與程孟陽商討有明一代之詩，仿元遺山《中州集》之例，「借詩以存史」，時孟陽已前卒，故己身兼採詩史之兩事，乃迫於情勢，不得已也。(頁 1007)故編《列朝詩集》主旨在修史，暗寓復明之意，論詩則為次要。在論杜甫時，尤注意其詩史一個特質，此之前，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如牧齋所為之詳盡者，未之見也。(頁 1014)例如吳梅村家藏稿內，未見有挽錢悼柳之作，殊不近情理，或因清高宗曾賦題吳梅村集詩，贊賞備至，儻梅村集內復發現關涉稱譽牧齋之作，則此獨裁者將無地自容。故可能係當日諸臣及吳氏後人，在家藏稿中，刪削此類篇什，藉以保全帝王之顏面歟？(頁 1015)故牧齋「借詩以存史」，與寅恪「以詩證史」乃異曲同工之妙。以上引文，參見《別傳》，下冊。

余英時曾就學術淵源與人文研究兩方面，論及陳寅恪的著述包含了實證、詮釋兩大系統，實證系統既由中國傳統乾嘉考證學派出發，亦受西方「蘭克史學」影響，是科學的史學；而詮釋系統則繼承了漢家故物「言不盡意」的箋釋索隱法，同時亦受德國「詮釋學」影響，^{註 88}顯示了兼攝中西、充分表現嚴謹穩實的研究根柢。然而正如緒論所言，陳寅恪史學第三變為「心史」（1949-1969），正是頌紅粧的階段，陳寅恪超越了專業史學的觀點，自云：「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註 89}捐棄「故技」，即放棄第一期塞外史、敦煌學的史學方法，亦不循第二期乾嘉考據之舊規。而以新方法，新材料，作一遊戲試驗，完全不同於過去嚴肅文字所呈現的正規史學專題或學報論文。《別傳》一書，通過錢柳陳及其他相關人物活動，寫出明清興亡的一個側面，但非正統的興亡史，而是悲歡離合的故事，更是歷史悲劇，由所有明清痛史數不清的人物所共同釀成的大悲劇。因為強調悲劇原則超時空的普遍性，就將自己所親歷之新痛史帶進個人書寫中。^{註 90}故《柳如是別傳》作者並不能置身事外，該書寫於作者流寓昆明的抗戰時期，故該書的緣起，乃自己所遇大悲劇的緣起，中國正在地變天荒，個人正在親歷新悲劇的全部過程，故其詩文正好相互呼應，該書正也是自己的心史，頗有遊戲試驗的性質。

註 88 參見余英時著，〈書成自述〉，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7-10。另關於陳寅恪的詮釋學方法運用，詳參李玉梅：《柳如是別傳與詮釋學》，收入同註 5，《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頁 163-179。

註 89 陳寅恪曰：「……弟近來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明清間詩詞，及方志筆記等）。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輟，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轉引自同註 9，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第八章，風暴中的孤寂者，頁 212，引《敦煌語言文字研究通訊》1988 年第 1 期，〈憶陳寅恪先生〉。

註 90 余英時根據陳氏自陳「遊戲試驗」說，叩合其史學方法的轉變，說明第三變的心史所具有的遊戲試驗性質。詳參氏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67-375。

讀者讀其書，必定為其繁複考證所炫惑，愈熟悉其著作，愈陷入見樹不見林的境地，考證確實引人入勝。然而本書的主要貢獻與基本意向卻不在這些細節上。陳寅恪要寫的是一個充滿生命 / 情感的完整故事，精妙的考據，建立了許多不易撼動的史事，這些史事一個點、一個點連結，像磚塊、鋼筋最後築成了一棟樓宇，但住在其中樓宇中的人，各有充沛的生命力，各有不同的性格互動，欲重建血淚的人間世界，非靠考據之功，而要依賴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奔放馳騁的歷史想像力，基於對人性內在面具有的深刻瞭解，又深入異代人物內心活動中與之共鳴，又必需受歷史客觀情況的制約，然後史家還必需以切身經驗印證於史事，於是作者便不免在著作中現身說法了。因此，陳寅恪《別傳》一書最精彩部份，往往非考證所能為，而靠想像力的飛躍：入情入理的想像，絲絲入扣，雖不能證實，讀來卻彷彿親見其事，此乃想像力駕馭考證，而非由考證建立起來的歷史事實。就這點而言，已經像小說（再次印證遊戲試驗），只是史家的想像必在特定時空，並受證據限制。^{註 91}

（三）眼口耳心

陳寅恪游走於歷史長廊，建構隱晦歷史，細數文學典故。不僅以時間為經，納入諸多材料以把捉柳如是一生行誼，在循線討論時，經常不斷節外生枝，不斷回頭補充注釋，而後前呼後應，一氣呵成，閱讀者彷彿如跋千山涉萬水，行路顛躓。《柳如是別傳》所面對的明清痛史，那些藏身於詩詞文賦尺牘中的典故，晦暗隱祕，陳氏一一予以解密，使得《別傳》一書儼如一部龐大的解碼機器。

註 91 余英時引柯林烏德《歷史的理念》提出，史家通過「現在」才能重建「過去」，二者無法截然劃分，故在想像中重建「過去」，便往往以「現在」為證據。余英時以柯林烏德的《歷史的理念》來闡明陳寅恪《別傳》一書非凡歷史想像力的運用，詳參氏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70-373。

註⁹²陳寅恪自云：「搜取材料、反復推尋、鉤沈索隱，發見真相」，但「能否達到釋證此詩目的之十分之一、二，殊不敢自信。」註⁹³文本中留有無數空白，有空白隙縫便要避瑣細地作精密閱讀、填補空隙，或深入人物心理探微，陳寅恪在文中不斷轉換著作者與讀者的身份，尋求創造性思維與詮釋。

然而任何填補空白、心理分析的考證，均不必定是確解，陳寅恪並非不知，其自云：「似此心理之分析，或不免墮入論詩家野狐禪之譏。……亦可借此使今之讀詩者，一探曹洞中之理窟，未可謂為失計也。」註⁹⁴一方面作為提供史實推測的線索，擴大歷史認知。另一方面則如余英時所說，陳書少數詩文採取「猜謎」、「索隱」的解釋，確有過度解釋的現象。然陳氏的「自創暗碼」，目的不在作猜謎遊戲，而在發洩滿腔憤氣。陳在《別傳》中對古人隱語挖掘「深曲」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註⁹⁵陳寅恪運用傳統國學鉤沉索隱工夫，填補了許多詩文中的空白，為史實作了最精細入裡的解讀。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不僅嘲諷陳氏、程氏、錢氏、柳氏，乃至天下笨伯等古人，亦頗能自嘲：「亦足見寅恪使事屬文之拙也。」註⁹⁶作者書後，「草此稿竟，合掌說偈」曰：

註 92 陳文華認為陳寅恪《別傳》一書有「俗成暗碼」與「自創暗碼」的運用，作為通解寅恪先生詩文的基本法則，余英時亦頗同意，並撰文回應。余英時以為《別傳》一書，因此，該書之所以不易閱讀，乃在於對這兩類語碼解讀的困難。詳參陳著〈何罪斫頭〉，《商工日報》，1984年8月24日。余著〈古典與今典之間——談陳寅恪的暗碼系統〉，收入同註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163-175。又著〈文史互證：顯隱交融——談怎樣通解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同上書，頁177-194。

註 93 引自《別傳》，中冊，頁593。

註 94 引自《別傳》，中冊，頁577。

註 95 詳參余英時著，〈書成自述〉，收入同註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177。

註 96 引自《別傳》，上冊，頁143。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繁瑣冗長，見笑君子。

失明贖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臥榻沈思，然脂暝寫。痛哭古人，留贈來者。^{註 97}

如此看來，本書充滿各種嘲諷效應的聲響，不僅有笑聲、嘲諷聲、感歎聲、歎歎聲，其實亦包含了哭聲。陳寅恪以《柳如是別傳》為其心史，本於一場遊戲試驗，無怪乎可以：「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陳寅恪詩)。此書與舊作異趣，不受史學戒律所束。呼應了陳寅恪「明清痛史新兼舊」、「焉得不為古人痛哭耶」的心聲。^{註 98}

陳寅恪既是史學家，亦為文學家，寅恪在嚴肅的史學考證文中，有時興來亦可戲仿昔人成句，賦成多情感傷之短詩數章。既具史學精神，更具文學解悟的閱讀趣味。全書有如一張地圖，循著不同的線索，尋覓目的地，可曲徑通幽，亦可大通登堂，探索大時代中之家難國變，亦可細繹兒女情長。讀者有時在文獻的泥淖中匍匐前進，有時則跳躍或滑行，時而轉身、回顧、瞻望。由文本的型式來看，行文上隨時插入一個見解，不斷注釋補充，正文有時暫停，轉由注釋當道，而注釋中又不斷的再出現注釋，引證繁複，形成「節外生枝」的現象。^{註 99}有時回到正文時，已經翻越幾重峻嶺，來到柳暗花明之地。陳寅恪的寫作，便如此考驗讀者的專注與耐心，稍一不慎，便再陷山中迷霧。但是《別傳》的

註 97 引自《別傳》，下冊，頁 1250。

註 98 參引自余英時著〈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收入同註 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74。

註 99 如《嘉定縣志·宦蹟門》「孫致彌傳」一段，傳文僅有三行餘，至「年六十八」以後，轉為「寅恪按」的注釋，而這段注釋中不僅有注釋的旁文，還夾入了作者評點意見，共佔了兩頁三十一行，可謂「節外生枝」最佳示範。詳參《別傳》，上冊，頁 156-157。

豐富性亦在此顯現，寅恪總是帶讀者緩步邁向一段段無法預期的發現之旅中。

《柳如是別傳》並未遠去，它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不僅具有史學的典範意義而已，同時亦對文學研究者帶來莫大的啟發性。筆者本文，體察陳寅恪用他的眼睛細讀了什麼？用他的聲口嘲諷了什麼？當他目擊以後，他用耳朵聆聽了什麼時代的聲音？透過他的眼、口與耳又傳達了什麼心意給我們？本文僅是筆者《柳如是別傳》讀後的筆記與一隅之識，筆者的閱讀工作到此告一段落，敬愛的讀者，您的閱讀才要開始……。

Precise Reading and Jocosity: Notes after Reading “the Biography of Liu Ru-shi”

Mao, Wen-Fang *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Liu Ru-shi” was published in 1980. It once brought the historians to a great debate and tha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 in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er, however, was attracted to the literary interest in the biography. Chen Yin-ko (the author) used his marvelous imagination to transform this historical masterpiece into a fantastic novel. He led the readers to journey the literatures, to pay attention to every detail, and to make precise inferences. In addition, the writing also shows the author’s sense of humor; it indirectly reflects all kinds of life anxieties. It is witty but jocose and contains both joy and sorrow. The researcher, from the reader’s point of view, pointed out two main reading aspects and introduced excellent examples. The researcher considered this biography as the best model for participation in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 : Liu Ru-shi, Cian Cian-yi, Chen Yin-ko, precise reading,
joco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